

# 中国的卫星党

[美]詹姆斯·D·西摩 著

牛旭光等 译

DG97/28

D613  
J4

84248

# 中国的卫星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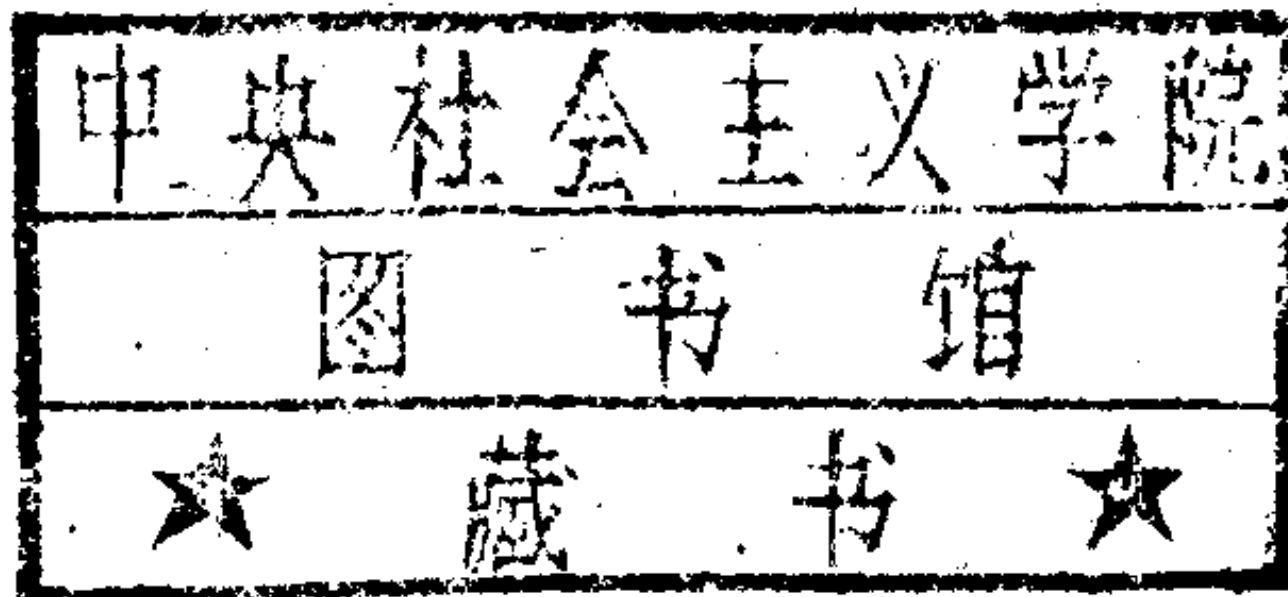
[美]詹姆斯·D·西摩 著

牛旭光等 译



\*200134960\*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

## 译者序

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在这一政党体制中，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中共并存、合作。如何认识这一新型政党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主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仅为国内不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而且也日益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注意。《中国的卫星党》便是一位外国学者专门探讨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论著。

本书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自70年代以来，他已先后出版了《中国：革命重建的政治》（1976）、《第五个现代化：1978—1979年中国的人权运动》（1980）和《中国法权史》第一卷（1985）等著作。《中国的卫星党》是他于1987年发表的一部新作。在这本篇幅不长然而内容新颖、论述独到、颇有趣味的小册子中，作者重点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和地位作用，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

作者十分重视我国政党体制的独创性和特殊性，他首先把这种体制同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作了现实的比较和历史的溯源，认为中国的政党体制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抄袭和模仿。他指出，在三四十年代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大都以西方民主制为追求目标，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力量弱小。只有坚持以农村为基

础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有力量与国民党抗衡。这样，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自然就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不仅“孤立了国民党，使之失道寡助，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遭失败”，而且“使共产党体面地控制了那些愿意跟着新政权一道前进的非党人士”，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并存、互相监督的政党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各民主党派普遍进行了组织整顿和功能调整。同时，它们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它们能够在共产党和一定社会阶层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可以与社会上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保持联系，”“听到这部分人的呼声。”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李维汉等就已多次讲话，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作用。刘少奇也对民主党派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民主党派的工作重点不应放在对其成员的改造方面，而应放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方面。”当时，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各民主党派组织和人数也有较大发展。但50年代后半期，情况发生逆转，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许多民主党派成员被打成右派，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此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便不再起什么作用。

反右斗争以后，中国政治气氛继续向“左”发展，终于导致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民主党派受到严重冲击，许多成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关



押。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各民主党派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作者指出，在民主党派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其组织仍然保存下来，是因为“受到了当时中国两位最有权威的领导人的保护。”——毛主席在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时，明示“民主党派还是要的”，周总理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尽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

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民主党派的情况。作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建民主党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共为改善民主党派的形象作出了很大努力，各民主党派在艰巨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逐渐恢复了组织发展，并且开始重新拥有自己的报刊，能够对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批评。1983年，以培训民主党派干部和其他统战部门干部为宗旨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也得以恢复办学。作者认为，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已恢复到50年代初、中期的程度，它们不仅在普及教育、智力支边和为四化建设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而且在祖国统一和三峡工程等重大问题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全国和地方的政协、人大中，民主党派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作者认为，“民主党派的前途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如果共产党政权取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各民主党派也将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建国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了解这些获得新生的民主党派，就有必要到中国去做一番

实地考察。正是因此之故，作者于1984—1985年的冬天专程来到中国，通过与民主党派成员座谈访问等方式调查了解民主党派的各方面现实情况。该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反映了这次调研的成果。

从《中国的卫星党》的基本内容和西摩先生为写作此书而做的理论准备、实地调查来看，作者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客观的、严谨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可以看出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即使今天，外国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人仍然不多，研究民主党派并向外国读者介绍的人更是寥寥。在这种情况下，西摩先生能够在广博的理论材料（这一点可以从本书各章的详尽注释中看出）和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出这样一本专著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作者关于我国民主党派的评价和分析，也有一些不妥乃至错误之处。例如，作者有时用西方的政党观念来衡量我国的民主党派，认为“这些民主党派并不是政党，而只是一些发育不全的机体。”它们的存在，不是民主的体现，反而“使集权体制更为可行”，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分析和鉴别。

牛旭光

1992年2月于北京

## 序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一些被称作：“民主党派”的非正规的组织。这些党派成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之间。它们曾试图成为一支中间力量并发挥其影响，但却无力与中国的两大政党及其军队相抗衡，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夺得政权。1949年以后，这些党派为共产党政权所容纳。1957年，它们大胆谏言而遭迫害。“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几近消失，大约在1980年才得以恢复。对于中国民主党派的问题，现在有必要加以重新考察。

自50年代以来，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获得新生的民主党派身上已很难辨清它们原先的面目。要了解这些“新的”民主党派，就必须到中国去作一番实地考察。为此，1984——1985年的冬天我去了中国，我打算在那里尽可能随便地搜集一些问题，并且了解一下民主党派成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在中国不可能真正自由地进行调查。但这一次至少采访对象不是事先选择好的，座谈会也未经官方审查。实际上，这次整个调查活动都是民间进行的。我的这次中国之行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同时也没有得到并且没想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的任何帮助。

一共有十几位民主党派成员（他们基本都不在同一支部）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次抽样调查规模之小，以至从中了解的情况简直可以被当作轶闻来看待。如果在这次调查中有人敢说出自己的倾向，那末，其结果就是相当富有成效的。



然而所碰到的主要问题正是那些有代表性的民主党派成员不愿意接受一个外国人的采访，尤其在未获官方批准的情况下。他（她）可能是一个小心翼翼的顺从者，比较习惯于唯命是从，而不习惯于自由交谈，更不愿意冒什么风险。历史教会了多数中国人懂得：生存的秘诀就在于避开政治风险。而我的采访对象无疑全是精明过人的。

以下六个党派是本书所要论述的主题。在论述过程中，多数党派的称谓将通常使用其简称（圆括号内）：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主要构成：中小学教师。规模：15000人（1984年）。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主要构成：一般知识分子。规模：30000人（1956年），50000人（1984年）。

九三学社（九三）。主要构成：高级知识分子。规模：12000人（1984年）。

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主要构成：工商界人士。规模：25000人（1956年），25000人（1984年）。

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主要构成：医卫界专业人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要构成：原国民党党员。规模：16000人（1956年），20000人（1984年）。

民主党派总人数据说在1949年是2万人，1956年发展到10万人（并且当时还在发展，但1957年人数不详），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降至6.5万人。1978年以后，民主党派得到发展，到1986年初，已达16万人。

在本书中，有两个团体（通常被看作民主党派）没有包

---

• 方括号内为译者所加。



括在内，它们是中国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致公党是由2300名（1983年统计数字）归国华侨组成的。台盟是由台湾籍人士组成，它比致公党还小。该党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本小册子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的。这项研究的第一阶段始于1959年，结束于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治和法律系就读时撰写的硕士论文。60年代，民主党派式微，而中国政治的其他方面吸引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注意力。在此情况下，我没有在这部早期作品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下去，这篇论文也没有发表。但是，我的这篇硕士论文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且50年代民主党派的令人兴奋的发展情况至今仍大部分不为人知。这样，本书的前半部分就采用了稍加修改后的那篇硕士论文；本书的其余部分则是在最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此，我谨向众多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谢意。首先，感谢O·蒙蒙德·克卢布、爱德华·弗里德曼和莱曼·P·范斯莱科在60年代初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其次，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同事们（迈伦·L科恩、安德鲁·内森、安德鲁·沃尔德等），在我将第七章提交1985年的一个讨论会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同样要感谢的是，主要由于约翰·多尔劳和陈兴豪（译言）帮忙，使我得以在1984——1985年冬天能够作为访问学者在香港大学服务中心作几次短期的访学。阿伦·保热情地让我使用了他的未发表的论述60年代和70年代民主党派的论文，这对我写作第六章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安妮塔·陈阅读了全书初稿并提出难以数计的有价值的建议。大卫·艾斯诺、肯尼思·利卜撒尔、里查

德·马德森、罗德里尼·麦克法库哈尔、道格·默文、里查德·索里奇和乔纳森·安格也提供了资料或提出意见。

但我最感激的是中国那些接受采访和安排采访的人。我向他们中的多数人允诺不披露其姓名。不仅如此，即使披露那些未曾得到许诺的人的名字，也未见得合适。我相信他们都是冒着风险被卷入这项调查的，因而我非常感激他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述如果有什么事实上的出入或解释上的错误，盖由本人负责。

詹姆斯·D·西摩

# 目 录

译者序	( 1 )
序 言	( 1 )
<b>第一章 共产主义与统一战线</b>	( 1 )
共产党国家中的非共产主义政党	( 1 )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	( 4 )
莫斯科的态度	( 9 )
<b>第二章 中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革命</b>	( 13 )
中间党派的历史背景	( 14 )
民主同盟	( 15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20 )
民主建国会	( 22 )
九三学社	( 22 )
民主促进会	( 22 )
农工民主党	( 23 )
认同共产党的胜利	( 24 )
对普通共产党员的影响	( 25 )
<b>第三章 中国的民主党派及其作用 ( 1950—1955 )</b>	( 31 )
组织改造	( 31 )
民主党派在政府中的活动	( 37 )
运动与改造	( 41 )
<b>第四章 转折之年——1956</b>	( 51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51 )
组织变化和成员发展 .....	( 52 )
<b>第五章 民主党派与“百花齐放” (1957) .....</b>	<b>( 61 )</b>
“争鸣”——根本宗旨 .....	( 61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65 )
后果 .....	( 72 )
<b>第六章 民主党派的晦暗期 (1958——1978) .....</b>	<b>( 85 )</b>
神仙会 .....	( 85 )
文化革命 .....	( 86 )
<b>第七章 民主党派的今天 .....</b>	<b>( 92 )</b>
民主党派的组织情况 .....	( 96 )
民主党派的作用 .....	( 107 )
<b>第八章 结束语 .....</b>	<b>( 119 )</b>
<b>译后记 .....</b>	<b>( 130 )</b>



## 第一章 共产主义与统一战线

从根本上讲，共产主义革命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乔治·康拉德和伊凡·朱丽叶认为，俄国和东欧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由知识分子攫取了政权。<sup>①</sup>虽然不能以此来分析中国革命，但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最终取得了特权地位这却是事实。这些人包括欧式小政党和组织的成员。尽管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很难给这种现象找到根据，<sup>②</sup>但许多共产党国家仍标榜本国存在“非共产主义”政党和“联盟”，或者声称组织了统一战线政府。

### 共产党国家中的非共产主义政党

在苏俄，多党制在1917年革命之后没几年就废除了。与东欧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还存在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不同，在俄国，同布尔什维克并存的最重要的政党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在为期四年的时间里，孟什维克党人通过合法手段竭力取代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他们虽然被允许存在，但其活动却受到制约。孟什维克的经济纲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类似于后来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在1919年和1920年间，它使孟什维克在工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孟什维克终结于1921年初的一系列逮捕行动，照一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孟什维克的毁灭不是由于法律，而

是由于“暴力和欺骗”。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掌了权的东欧共产党发现，贸然取缔他们过去的竞争对手并不见得有利。非共产主义政党通常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新政府觉得，允许它们继续存在，至少在名义上是有用的。在东欧国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制同中国的多党制极其相似；在这一制度下，非共产主义政党竭诚为统治者服务。然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非共产主义政党太沉缅于真正反对派的角色，以致共产党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削弱它的力量。在一些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非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消亡。④

但时至今日，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仍然有卫星党。⑤东德的情况同中国相类似，各个政党有意识地同西德的同名政党相对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一开始就在人民议会中占有席位；谁要是不同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合作，苏维埃机关就撤谁的职。虽然一些部长由非共产党人担任，但这些人几乎从来就是现行体制的坚强支持者。这些政党的存在图有虚名。尽管当局不让它们解散，但却通过让共产党员渗入其组织的办法以防不测。⑥这些政党很象中国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也同中国的多党制很类似。关于捷克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我们庆幸地看到爱德华·塔波斯基已对此作出研究。爱德华本人就是1948年事变前捷克政府的一位官员。在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是紧跟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并作为党的“助手”，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而奋斗。⑦执政党按“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改组了旧政党。只有那些得到信任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非共产党官员不仅要对自己的上级，而且也要对同一级的共产党机关负责。所有这些特点都与中国的情形非常相似，特别是在50年代——非共产主义政党规模的狭小，它的奉行共产党方针的报刊，党派在教育中的作用（通过讨论会等形式），以及非共产党候选人由共产党指定，并且在“民族阵线”的招牌下选举出来担任公职等，均是如此。

尽管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彼此类同，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一国照搬另一国的结论来。捷共和中共关于保留非共产主义政党的决定大概是各自独立作出的。捷共早在1948年就率先这样做了，而那时，中共才提出建立多党制国家。如果说有所仿效的话（并无这方面的根据）那么，也只不过在于同样提出了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问题。

也许是两国的客观条件需要非共产主义政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截然不同。例如，中国被认为直到工业化完成以前都需要一个资产阶级，因而也就需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点并不突出，因为这个国家在1948年的工业化程度不次于处在“解放”时期的任何国家。另一个重大差别在于两国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早期作用不同：在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非常重要，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可以同掌权前的共产党相抗衡；而在中国，这些小的中间派别从来没有真正影响过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它们没有军队，而且一般都追求脱离中国人民实际的西方自由主义。最后，两国的不同点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就已实行着西方式

的民主政体。这些差异并不能决定是否实行多党制。根据捷克和中国的这三个不同特点，可以明显看出，两国共产党各自决定保留原先的国内竞争对手，并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在于，都有从事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传统。

##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

不言而喻，世界共产主义中统一战线策略的出现，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无产阶级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拥有大量城市工人阶级的工业化国家，而可能在那些实际上不存在无产阶级、先前受外国资本家剥削的不发达地区发生。道理很简单：弱小的共产党应该同所有进步的和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然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统一战线策略则更有特色，运用得也更为娴熟，并最终使他们夺取了政权。

最初要求共产党参加统一战线的是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列宁的指导下，这次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应该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团体合作。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被视为半殖民地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理应同国民党联合；1923年，国共两党实现了这一联合。但这次合作并不稳定，到1927年就中断了。

30年代，毛泽东取得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在这以前，阶级之间、党派之间的联合尚不稳固（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内的意见不一），而且总的说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毛认识到，必须既防止1927年以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



机会主义”错误，又要避免1927年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sup>⑧</sup>但合作中要符合这双重要求并非易事。任何联盟如果不能够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共产党就不会对它满意。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者”——这里指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党是如何在1937年化解同国民党的对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无须详述其细节。简单说来，日本在1931年进攻满州之后，共产党就感到有必要重新与其它党派合作。次年，共产党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但国民党是否也是合作对象则不明确。1935年，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最后确定，这标志着共产党进一步抛弃了“关门主义”。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在一段时间里，两党的合作卓有成效。但从1938年起，两党关系又趋紧张，并在以后几年，两党之间发生了几次公开对立的事件。尽管如此，表面上的政策仍一如既往。共产党同非共产党人士在共产党统治区域进行了合作。1940年实行的“三三制”规定：共产党员、国民党人士和其它人士（“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府机构中占有相同比例。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制度少不了中间党派。

虽然那几年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革命的理论基础却是共产党关于阶级合作的一贯思想。对这一问题，我们从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即可找到答案，而不用去研究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所实际执行的各项具体政策。毛关于阶级分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年）。<sup>⑨</sup>

他的阶级理论直到1939年才定形，那一年，他写了《中

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勾划出了革命的阶级基础。“城市下层阶级和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是革命的潜在同盟军，而地主阶级则注定反对革命。介于它们之间的是资产阶级，其成份更为复杂。大资产阶级（买办）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仇视革命，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因而，如果联合阵线反对某些列强，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可能会站在革命一边。同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工商业者）的合作比较容易，他们谋求发展中国的工业，也谋求经济的独立，因而可以指望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赞成革命。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经济上又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两面性在人民革命力量壮大时表现得尤为明显。”<sup>⑩</sup>“但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可能站在革命一边，因而仍然是一个较好的同盟军，但必须采取慎重的政策。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不单纯，<sup>⑪</sup>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一般而言，他们站在革命一边。尽管如此，这些小资产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获得解放。”毛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背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虽然认识到了自己需要知识分子，但又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总体上并不信任他们。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

\*原文标题实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该文第一章的题目是“中国社会”。——译者注

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的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些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sup>⑫</sup>

同样，小资产阶级其它成员——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都会有两面性。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虽然毛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点明民主党派的问题，但总有一天民主党派会明确表现出同样的立场。

在完成这篇文章一个月之后，毛又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sup>⑬</sup>在该文中，他描述了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毛认为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以及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将属后一类型的国家。这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国家的唯一选择。几个月之后，毛提出即使对不革命的人也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只对那些坚决反共的顽固派才断绝往来。

1941年，统一战线的格局进一步明了。毛在一次陕甘宁边区参政会上的演说中承认，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并不总能和谐共事。因此，他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他谴责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

“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

的人是极少的……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sup>④</sup>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后来经常被引用。这表明，政府中的统一战线并非只是宣传手段，而是改善政府工作乃至党自身的必要一环。

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以及194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种新型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中，不太强调反帝的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没必要非同国民党反动派合作不可——但毛似乎决心要避免1927年以后那种“一切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新的方针是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国民党虽力求在打败日本之前避免同中国共产党正式决裂，但其所为却与此相反。因此，在1945年以前的几年，国共关系走向倒退。与此同时，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左翼却开展了大量的真诚的合作——尽管后者处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到了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从而确保了在同国民党决战时力量上的优势。每当中间党派受到国民党排挤时，共产党就来竭力争取他们。一位游历过中国的西方人士写到：“我在延安遇见过几位民盟成员，他们在政府中任职，并就共产党对待这些小的民主党派的态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sup>⑤</sup>延安那种名义上的联合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包括资产阶级左翼，实际上就是1949年以后统一战线的雏型。

1945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毛作了题为《论联合



政府》的重要报告。⑥他指出，新民主主义不仅是多阶级的，而且是多党派的联合，中国的各中间党派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同马列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它表明统一战线已不再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而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统一战线必须为毛的更伟大的目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理论可归于对资产阶级的两分法，即认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有助于革命事业，而其余的少数则是反革命派，是革命的对象。毛并没有就该阶级每一部分的政治态度作严格的区分。可以合作的成员被允许作为一个阶级继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不可合作的成员将被拒之门外；对于骑墙派则可以经过斗争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方略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摒除了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论联合政府》还对未来共产党的基本特征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要成功地建设起这样一个国家，就必须至少获得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渊源于毛泽东在40年代所坚持的修正过的统一战线政策。

## 莫斯科的态度

苏联的理论家们对毛泽东的思想显然不知所措。莫斯科试图操纵亚州国家的革命，按照莫斯科的设想：整个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强大到无需联合资产阶级也能进行革命的时候才愿意同无产阶级合作。安德烈·日丹诺夫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并没有明确表明他是否赞同毛主义的新尝试。<sup>①</sup>两个月之后，虽然乔治·朱可夫在有权威性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做法。<sup>②</sup>但在同一个月，莫斯科却又对毛的一篇讲话作了重要修改，在这篇讲话中，毛谈到，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团结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很显然，他坚持了正确的“左派”观——即在当时，共产党应保持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sup>③</sup>只是到了1949年中，《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指刘少奇——译者注）的一篇文章，<sup>④</sup>莫斯科才完全认可了毛泽东的现实立场。

苏共和中共路线的唯一差别在于对多阶级国家延续时间长短的认识不同。苏联直到50年代还认为，在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不可操之过急。这个难题一直到1956年后的苏共二十大得以解决。从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基本上失去了意义。<sup>⑤</sup>

#### 注释：

①乔治·康拉德、伊凡·朱丽叶：《走上阶级统治之路的知识分子》纽约，1979年版。

②在50年代，中国的理论家力图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多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依据，但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参看胡西圆（译音）《我们为什么实行“长期共存”的方针？》，刘少奇：《政治报告》，张执一《对长期共存政策的认识》，于光远：《现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实质》。后面这篇文章引用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

③伦纳德·夏比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1922）》剑桥，1955年版，第206页。

④参见史蒂文·科尔兹编《东欧的命运》，第259、287、299页。

⑤参见奥斯卡·哈勒基：《波兰》，载科尔兹编：《东欧的命运》，第134页。

⑥J·P·内特尔：《东德及其苏维埃政策（1945—1950）》（伦敦，1951年版）；库尔特·格拉泽：《苏维埃德国的政府》，载《战后的德国政府》（爱德华·H·里奇费尔德等编，伊沙卡，1953年版）

⑦爱特华·塔波斯基：《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问题》（1959年3——4月刊）第20页。

⑧李维汉：《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见《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3——11页。

⑩《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640页。

⑪这一概念有时包括农民，但本书不这样使用。

⑫《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卷，第641——642页。

⑬同上书，第662——711页。

⑭《毛泽东选集》（版本同上）第3卷，第810页。

⑮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466页。

⑯《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

1029——1100页。

⑰安德烈·日丹诺夫：《国际形势》。《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1947年11月10日。

⑱摘自约翰·H·考茨基：《莫斯科和印度共产党：战后国际共产主义战略发展研究》（纽约，1956年版）第2章。

⑲同上。

⑳刘少奇：《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

㉑参见本杰明·J·舒瓦茨：《意识形态和中苏联盟》，霍华德·J·波尔曼编：《莫斯科——北京轴心：力量与困难》（纽约，1957年版），第129——131页。



## 第二章 中国的中间党派 与中国革命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的各种势力都在探求如何把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移植到本国来。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主张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自由竞争实属罕见。以往的政治思想家总是强调和谐统一，一旦失去这种和谐，就意味着儒家政治制度的崩溃。虽然儒家政治并非十足的不民主政治，统治者受惠于其臣民，他一旦垮台，就将改朝换代。但从理论上讲它是专制制度，其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形式上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儒家的这种基本规范在中国已延续了二千多年，直到近代才开始受到质疑。统治者就是运用儒家规范来治理国家。在那时，只有封建士大夫有权谏言，施加影响，而广大黎民百姓只有俯首听命。

因此，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由观念难于理解就不足为怪了。当许多知识分子为那些西方思想激动不已时，其他人则把它们同西方帝国主义挂起钩来。不管怎样，帝国主义就成了阻扰人们追求20世纪人类新生活的替罪羊。中国的两个政党不同于民主国家的任何政党，尽管它们也都试图唤起民众的政治热情。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按照苏联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都奉行了政治极权主义的原则。它们无意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组织群众支持其既定纲领。

## 中间党派的历史背景

除上述两个主要政党之外，中国还存在一些具有各种政治纲领的较小的党派。例如，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创建于1917年），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当黄炎培着手实施其教育计划时，才发现他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如同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一样）。<sup>①</sup>“中国青年党”（建于1918年）\*倒是一个政治色彩明显的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凡尔赛的签约，使中国青年党最早萌发了政治自由的倾向；其左翼分离出去加入共产党后，它就逐步同保守派和军阀同流合污了。<sup>②</sup>

1927年，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少数叛逆者成立了一个通常被称作“第三党”的政党。<sup>③</sup>该党公认的领袖邓演达直到1930年还流亡于欧洲。他在那里宣传革命运动，并且可能在柏林建立了一个海外活动总部。回国后仅几个月，他就被国民党杀害了。<sup>④</sup>第三党随之陷入混乱，四分五裂。在抗日战争时期，该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其中之一是章伯钧）把它改组为一个左派小团体，1947年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20世纪30年代，由于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党派。在30年代初，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成立，其领导人是梁漱溟——一个关心乡村发展的知识分子。<sup>⑤</sup>1931年，张嘉森（张君勱）和一些同仁建立了“国家社会党”。几年以后，该党就与最初建立于北美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为“民主社会党”。这一保守派政党是由少量知识分子

\*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1923年。这里可能系作者笔误。——译者注。

组成的。⑥

1936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整个中国，“全国救国会”应运而生。几个月后，该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即“七君子”⑦由于政治上左的倾向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一事件激起了公众的义愤。救国会力主团结抗日，其领导层中一些人还是亲共分子。它是所有小党派中最有影响力的党派，因此，也最为国民党政府所忌恨。⑧

## 民主同盟

这六个形态各异的组织\*不仅是装点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党派，而且在1939年联合组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个联盟和国民党、共产党一起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统一建国同志会在经历了组织调整以后，于1941年3月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10月（应为9月——译者注），同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再次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39年该同盟最初成立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民盟便以各种方式扮演起一种中间角色来。但是民盟为了表现自己的作用而反对总统蒋介石，却使蒋介石不无道理地认为它是受共产党的操纵。民盟的每一个活动家凡进行公开活动都要冒生命的危险，尤其在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诗人闻一多就是在昆明举行的一次集会后被枪杀。）所以，活动经常被迫秘密进行，活动的

---

\* 这里所讲的六个组织，系指组成民主同盟的“三党三派”，即“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  
——译者注

基地也通常设在香港，（不管在日本占领前还是占领后，香港都是一块殖民地。⑨）香港的环境为坚持走中间道路的民盟成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民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非劳动者⑩的政党。它不过是一个成份复杂的自由联合体——这也正是它政治上软弱的原因之一。民盟还包括一些非党非派的人物。⑪ 1944年就任该盟主席的张澜便是如此。他被推选为主席，显然主要是因为他为中间力量所推崇，同时，还在于他既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又与国民党有交情。张是一个正直坦率、精力充沛的人，曾短期担任四川省省长之职，而久任四川各大学的校长之职。因此，他是一位并不完全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的重要领导人。他似乎一直没有和民盟内的各党派发生联系，他情愿被人视为独立人士。与其说张是某一特殊政治纲领的代言人，不如说是主张民族团结，以求抗战胜利和恢复国家和平的倡导者。在中国两大党之间虽然他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他就任民盟主席期间，民盟始终表现了偏左的倾向。他担任民盟主席职务直到1955年去世。⑫

还有一些关于民盟在抗战期间活动情况的问题。据传，民盟曾从共产党那里获得经济资助。⑬ 而且国民党人士宣称，在1944年11月，民盟就向共产党许诺不再和国民党合作。⑭ 若从最坏处考虑，国民党政府是由于对民盟实行了高压政策，而使民盟大多数成员与自己疏远，民盟也由此从中间派变成反对派。这一立场在乔治·马歇尔的和平调解失败以后更加强了。那时，民盟也曾试图继续保持中立，但是并未成功。虽然民盟和共产党政策上的差别是举目公认的，但这种差别现在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如民盟的一位发言人



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非常同意共产党关于中国需要民主的观点。既然共产党修改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明确承认私有财产，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与他们取得了一致。他们的经济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同时还相信，当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不会回复到他们战前那种较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尽管我们对此尚无把握，但却相信战后共产党可能会较前更民主一些，否则他们还会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共产党没有单独执政的野心。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很了解他们。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并且懂得中国人民决不会同意一党专政。<sup>⑤</sup>

在1945年，人们还不易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影响的产物，而要消除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否则便不可能见到民主的曙光。

在战后国共两党为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的几次流产的谈判中，毛泽东坚持要给民盟36个参政会席位中的6个席位。因为每一项重大决定，都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所以他考虑要让一些非中共人士和10名共产党参议员合起来能够在议决时行使否决权。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sup>⑥</sup>在这次会议上，各派力量间的冲突更加明显了。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对垒本可以促使民盟自身各派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但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由于民盟控制在多数左翼分子手中，以致曾经出掌民盟秘书长之职的保守的中国青年党大权旁落，而原共产党员周新民成了副秘书长。<sup>⑦</sup>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到



1946年末，由于国民党对民盟的冷遇，使得民盟多数成员拒绝参加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内的两个党派断绝了同民盟的关系并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两个党派就是现在仍作为国民党的卫星党在台湾存在的青年党和民社党。⑧）这样，民盟由于失去了一部分保守分子和中间分子，因此就更难像以前那样和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⑨

正是这个较为左倾的联盟参加了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该盟竟在总共38个议席中获得了9席。不过，国民党也为保守的青年党安排了5个席位，从而使国民党仍可保持优势。而共产党只占了7个席位；就此而论，很难说共产党从民盟那里获得了多少支持。国民党玩弄花招拉拢青年党的做法激怒了民盟的多数成员，因为严格说来青年党毕竟仍属于民盟的一个组成部分。民盟意识到，国民党为青年党安排不相称的席位（对国社党也是如此），目的是要诱使他们脱离民盟从而削弱民盟的力量。这就使多数民盟成员愈益远离国民党政府。

1946年，把持国民党的右翼努力对民盟进行了威胁和迫害。他们将民盟总部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民盟的著名人物罗隆基极力敦促驻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插手阻止这种行为。一位大使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罗教授最担心的是，他确信民盟总部周围的那些人都是秘密警察，而他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并受军事法庭的秘密审讯。以前就发生过不少此类事件，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捕，并由此而神秘地失踪。顺便提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证明罗教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经查验，10月23日（1947年）及其以后的一些日子里，跟踪他去大使馆和使馆办事处的那辆

吉普车的车牌号，大使证实了那辆吉普车是戴笠（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手下的。……有人提醒罗教授，民盟不能再指望美国政府干预此事。

因此，虽然一些美国人同情民盟，<sup>②</sup>但美国政府却装聋作哑。几天以后，南京政府内务部宣布民盟亲共并予以取缔，尽管国民党温和派反对这样做。官方文件这样讲道：

“众所周知，中国民主同盟长期以来和共产党相互勾结，图谋不轨。……鉴于共党叛乱日甚，且民盟推波助澜，政府不再容忍这种违反国家宪法和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组织继续存在。为了维护后方的安宁和秩序，内务部不得不采取必要步骤检查民盟的行为。特此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sup>③</sup>”

对此，民盟曾面临着一次选择：要么作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要么解散。随着事态的发展，政府答应不再逮捕前民盟成员，除非他们从事公开活动。起初，民盟领导人表示他们无权解散组织，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妙，因而又宣布了民盟解散。

镇压中间党派其实并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打击共产党。共产党则通过自己的言行使大多数中间派相信，他们的未来和中国的前途都维系于共产党。

许多民盟成员认为解散民盟是非法的。民盟的一些支部转入了地下，或移至海外。张澜主席愤然去了上海，遂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软禁。（后来被共产党营救出来）。但多数民盟领导人流亡到香港。1948年1月，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香港举行了一次中央全会，与会者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消灭”国民党。会议还发表了

一个主要针对美国的外交声明。最后，民盟宣布愿意同共产党和民革结成统一战线。<sup>②②</sup>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称为革命的国民党，是由国民党的反叛者组成的。该组织的创立可追溯到1927年的南昌起义。其时，国民党的左派分子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在一起。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一团体成为一个秘密的，主要搜集情报的地下组织。<sup>②③</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革与两个新建立的组织合并。这两个组织分别是由谭平山、陈铭枢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促进会。<sup>②④</sup>民革的任务还主要是秘密搜集情报，策动政府官员和军队反叛。一位前地下工作者讲述了他那时从事的基本“破坏活动”：他跟踪那些同国民党官员和将军来往的外国人，以便通过他们获取情报。我就在国民党内部工作，我会用脑子记下秘密文件，而把重要的数据写在手上”。<sup>②⑤</sup>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只在香港公开活动，它于1947—1948年冬在香港进行了改组。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长期是中国南方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早在建党初期就同国民党有联系。1926年，他出任广东省主席；一年以后，当共产党准备在省府广州举行起义时，他对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数千人死于著名的“广州公社”。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以后，共产党才宽恕了他的行为。<sup>②⑥</sup>他对蒋介石也没有好感，1947年蒋介石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确切地

说，李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

蒋害怕李是有缘由的——1948年李几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府，虽然他当时仍流亡于香港，但其追随者却不仅遍及整个南方而且在北京（当时叫“北平”）也有。他设想把中国分成五块，每一块都建立一个半自治的政府。李虽然成了一位挂名的领袖，但实际上只控制广东和广西两省。到1948年6月，李决定成立一个新政府，但又犹豫不决，因为他不知道他在首府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态度如何。而且他想在美国总统大选前行动。他请求美国的外交官（他们完全了解他的意图），虽然这些美国人可能不愿意帮忙，但李并不知道他们的态度。他们并不大看重李，只是对他谨慎处之。李还打算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桂林设一个观察站（理查德服务中心）。7月份，民革在香港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该声明中没有提到成立新政府，不过从内容上看却是十分亲共的。只有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公布了这个声明。<sup>②7</sup>

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使李济深很快意识到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共产党靠拢，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让共产党来接管。而在共产党这方面，则尽量抹掉广州大屠杀的记忆。他们不久就宣布：李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继承了孙逸仙的三大原则和三大政策的“真正的”国民党。李虽然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但他却从来没有获得任何政治实权。据说，他总是沉湎于其作为军阀称雄南方的早期岁月。<sup>②8</sup>他的主要作用不过是在台湾潜在的国民党叛逆者面前充当北京橄榄枝\*的化身。

\* “橄榄枝”意为“和平的象征”——译者注



## 民主建国会

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1949年后，它没有和其他党派那样受到审查，而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作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的一个分支，它比其前身更加政治化了。职教社最初在黄的领导下参加了民盟，其目的和民盟一样，是要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1947年它被迫转入地下，从此就断绝了同民盟的正式联系。民建不仅是一个文化教育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商业团体。后者最终成了它的重心所在。<sup>②</sup>

## 九三学社

1945年9月3日，一个小的左翼学术团体“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举行集会，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遂将自己的组织改名为“九三学社”。这个名称取自开会的日期，其字面意义为“九三”。诋毁者把它戏称为“九个成员三个部门。”<sup>③</sup>虽然这明显是夸张的说法，但却正确地说明了“九三”从来就不是一个大组织。

## 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于1946年。同年，蔡廷锴创立了与此名称相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这两个组织的早期阶段很难把两者区分开来。对此曾有这样一种解



释：

由于名称相似，……两个组织被合并为一。但是中共后来又想保留诸多不同的党派，想利用这些党派来装点门面。加之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不甘人下，即不愿意位居蔡廷锴之下；而且也不愿接受“三民主义”或“国民党”的名称（虽然他曾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许多种职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民主促进会才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党派。<sup>⑳</sup>

## 农工民主党

最后，还有一个老党“第三党”。该党致力于消除国共两党间的争斗。<sup>㉑</sup>不久，它改名为农工民主党。这样更改党名可能是为了使该党对民众更有感召力。<sup>㉒</sup>

上述每一个党派都没有表现出巨大的感召力，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常常陷入困境的百姓通常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而各民主党派虽然有远见，认识到中国需要什么，但它们却没有办法去实现它们的目标。

前面谈到，美国人并没有插手这些中间党派。但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却认为，这些党派才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阻止内战爆发。他看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的腐败，而且国民党一意孤行。马歇尔认为，清除腐败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对党。因此，他主张这些中间党派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在国共两党之间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正如国务院的白皮书指出：“这些小党派……放任自身的分裂，因而不能够左右局势，阻止内战爆发，和对避免经济崩溃发挥应有的作用。承

受着全部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民就处在 这种悲惨的境遇之中。”<sup>②4</sup> 这些党派确实有自己的真正信仰者，但也有一些利用党派之名谋取私利的投机者混迹其中。<sup>②5</sup>

## 认同共产党的胜利

无论中国对民主有什么样的希冀，都有求于这些党派。而这些党派除了享有好名声外别无其他资本。它们人数有限，目标不明，<sup>②6</sup>影响甚微。照说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按照历史的逻辑，等待它们的应是可悲的死亡。然而它们并没有被消灭。之所以如此，并非它们力量强大，而是出于共产党的策略——共产党认识到将来这些党派可能会有用的。它们一贯主张中国人团结起来反对独裁，但它们势单力薄，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因此共产党没有直接消灭它们，而是把它们“俘虏”到自己一方来。这样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共产党实行这一策略的成效，1949年前后在不同方面得到了验证。起初，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孤立了国民党，使之失道寡助，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遭失败。最后，这一政策又使共产党体面地控制了那些愿意（或不得不）跟着新政权一道前进的非党人士。因此，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号召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又坚持认为，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之下。<sup>②7</sup> 这里强调“广泛性”和“坚强领导”似乎有点矛盾。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更加强调联合进步力量的必要性。由于使中间党派认识到站在共产党一边比保持中立或站到国民党一边对自己更有利，从而使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希望大为增强，为了贯彻

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sup>⑳</sup>共产党同在香港和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了会谈。1948年底，在哈尔滨就举行协商会议达成了协议，这个会议就被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由响应“五一”号召的20多个组织（其中有六个民主党派）的代表组成。

1949年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筹备会，制订了将在9月份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了“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中，有七条明显是为那些非共产党组织制订的。会议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共产党一手操纵下而产生，共产党没有向其他党派做出什么大让步。将来一旦发生意见分歧，则须恪守共同纲领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sup>㉑</sup>所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都经过共产党亲自挑选，这样就可以确保共产党获得一致的支持。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下旬举行。实质上，它是一次表明拥护共同纲领的集会。会上没有不同的声音，就像后来的历届会议一样，这次政协会议成了宣讲党的路线的论坛。会后，各党派总部都迁到了北京。

## 对普通共产党员的影响

统一战线政策是由中共的高层领导确定下来的。他们不打算取消中间党派。但普通党员好像并不热情支持这项政策。事实上，至少有一名地方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因这个问题被撤

职的。<sup>⑩</sup>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奋斗了几十年，而今却为什么又要白白地放弃斗争成果呢？这在党内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多次提出以后终于得到了明确的回答。来自党的领导层的一次较早的回答是在1949年1月：

“革命阵营……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该被忘记或被冷淡的……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广大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sup>⑪</sup>

自然，这样一种声明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打消民主党派的疑虑。但正是这样的声明，对那些不愿与非党人士合作的普通党员来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在一定程度上，它只是表明了领导层的愿望。

#### 注释：

①M·T·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第144页。

②参见《中国青年党史论集增刊》；刘冬炎（译音）：《中国青年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我见》。

③也称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有关“第三党”的更详细的材料，参见《汪精卫其人其事》。

④1951年，共产党处死了李希元（译音），因为他被指控在这一事件中负有责任。



⑤A·H奥勃里安特：《梁漱溟：对西方的回应》，《中国问题论文集》（哈佛大学地区研讨会）第7卷，马萨诸塞州剑桥1953年版，第3页。

⑥参见张嘉森：《中国的第三种力量》、《中国民主社会党纲领说明》；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卢易安（译音）：《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分裂》。

⑦一般译为“七君子”，但这种译法不确切，因为事实上有一位（史良）是女的。

⑧张嘉森：《中国的第三种力量》；肯尼迪：《中国民主同盟》。

⑨香港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夏为日本所占领。

⑩国民党中有人显然认为民盟在吸收工会会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它也不会有农民参加。

⑪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问题常常弄不明白，即：民盟是一个党派联盟呢，还是由这些党派的成员和其他个人组成的？起初，民盟的情况相当复杂，但是后来青年党和国社党（民社党）分离出去以后，它就成了一个没有中间机构的，由单个成员组成的党。

⑫这部分资料源自《张澜小传》，见肖叶娜、王尔德（译音）：《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第34—36页。

⑬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册第277页。

⑭参见彼特S·H·唐：《今日共产主义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纽约1957年版，第150页。

⑮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464—466页。

⑯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半数

来自六个单位，其余则是各方面的代表人士。

⑰中国国民党的资料把周称作“地下共产党员”，《问题与研究》1984年5月号，第76页。

⑱关于中国民主社会党，参见张嘉森《第三种力量》，霍华德·L·布尔曼：《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以及本章注释⑥引用的著作。关于中国青年党尚未见到这样的英文报道；这个党似在积极支持国民党。例如，1986年，中国青年党主席李璜指责外国支持台湾的民主运动。见1986年5月22日《中国邮报》（台北）。

⑲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对争取这个党派已完全失去兴趣。联络员雷震（译音）就曾被指派去和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谈判。（雷后来去了台湾，在那里他试图建立一个“中国民主党”，结果被投入监狱关了10年）。

⑳包括乔治·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莱顿·斯图尔特大使（见他的《在华五十年》）。1946年，他们鼓动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机密电文，批评蒋对中国自由分子的“残酷屠杀”和国民党政府日益增强的“诉诸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倾向。这个在今天被称作“秘密外交”的方针没有取得成功。

在民主党派这方面，共产党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接受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但后来，刘少奇却被指控为提倡过要美国和英国来帮助民盟。见《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本主义》，新华社1967年7月8日讯。

㉑1947年10月28日中国政府的声明，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1949年版，第839页。

㉒这次中央执委会三中全会的文件被收录在《中国民主

同盟三中全会》一书中，亦见伦阿·B·科尔：《新中国的统一战线》。

②③关于20年代民革的起源问题，参见尤金·Z·汉拉罕《中国红军的诞生》，1953年版，（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第107页。1957年8月，在罗隆基失宠以后，新华社断称1948年他在上海时本应给设在香港的民盟总部寄钱，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显然，民盟当时正面临经费困难。（新华社1957年8月10日讯）关于1949年以前民盟的详细资料，参见《和平民主统一建国志录》，《民主同盟文献》，《民主同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

②④肖、王在《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一书中认为这两个团体成立的时间是1942年，但其他资料则认为是1946年。李济深：《我党及其主张》，科尔：《统一战线》第48页。

②⑤《亚洲周报》，1985年7月12日。

②⑥参见哈罗德·R·伊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坦弗，1961年版。

②⑦《美国的对外关系》，华盛顿，1948年版。

②⑧肖、王：《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第11页。

②⑨同上书，第51页。

③⑩同上书，第63页。关于早期九三学社的情况，参见《工人日报》，北京，1956年9月12日。新华社1956年2月11日和6月14日讯，习仲勋《在九三学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③⑪肖、王：《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第54页。

③⑫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③⑬这个新名称是1945年最先由章伯钧提出的，见严新明

(译音)：《听章伯钧的狂热演说》。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毫无意义的新名称，直到1947年这个名称才被正式采用)。

③④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14页。

③⑤ 关于1949年以前的中间党派的一般资料，参见杨汉辉(译音)：《当代中国的政治教育》；张执一：《政治党派》、《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党派》、《中国各小党派现况》；俞润堂，姚传铨：《当代中国政党》，平心：《论第三种力量和民主运动》。

③⑥ 关于这些党派的纲领我谈的很少。它们(或至少是民盟)与国共两个大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更真诚地致力于民主——尽管所有政党都宣称以民主为目的。就经济纲领而言，中国所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赞成社会主义，但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有明确一贯的纲领。而共产党一经夺取政权，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从张澜这方面来说，他认为没必要提出容易引起争论的纲领性声明；相反，他主要关心的是防止民盟发生分裂。

③⑦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③⑧ 《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③⑨ 同上书，第25页。

④⑩ 1948年，潘祖刚(译音)由于敌视民盟和民革人士而被解除香港共产党组织部的领导职务。

④⑪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8页。



## 第三章 中国的民主党派及其作用

(1950—19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是一个相当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不管人们从哪方面来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都会联想到这种情况。不过，这一点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民主党派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新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如果在人民的正确引导下，不要对它们采取剧烈的镇压行动，它们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的。通过这些团体，可以与社会上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保持联系。否则，很难听到这部分人的呼声。

这些组织可以保留原先的许多成员，但不是全部。组织名称也可以保持不变，即仍叫原来的名称——民主党派。但是，这里“民主”和“党”的词义却有所变化，已失去了通常所理解的含义。民主党派虽然名称未变，但它们已经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

### 组 织 改 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控制。在接下来的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派的每一活动——甚至会议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

重组和监督民主党派的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职能部门

门——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负责。该部门还负责一些诸如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方面的事务。汉族人李维汉曾领导该部门工作达5年之久。\* 他曾在20年代初留学法国，回国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名重要成员。他参加过长征。后来，可能由于在党内斗争中他老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因而被逐出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统战部长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李在1965年前一直担任这个职务。① 在李维汉的领导下，一场改造运动在旧的民主党派内广泛开展起来。党派成员按地区编入支部或地方组织（基层组织）。② 支部负责人被告知如何领导其成员开展工作。那些反对改造的人，有的被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上去，但仍保留其普通成员的身份，有的则被开除。由于许多成员被开除，使民主党派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方向。

当然，真正的反共分子，如果只是被开除出民主党派而没有更坏的遭遇，那么，这可能算是幸运的。但是，既然不容许这些党派保留对立的政治观点，也就不能够限制其成员完全信奉共产主义。毫无疑问，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非人民”）不能够加入民主党派。另一方面，一个完全接受共产主义的人，无论其政治归属如何，他③ 都能尽心竭力地为国家工作。——他可以是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一员，他可以是交叉党员，也可以是无党派人士。然而，多数民主党派成员既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者。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民主党派应由那些介于两极之间的中间人士所组

---

\*这里显为笔误。实际上，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约15年。——译者注。

成。

1950年，各个民主党派都进行了组织整顿，有几个党派还在年底举行代表大会，接受了这种改造。目前，各民主党派已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资历较老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很典型。<sup>④</sup>它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共捐资。<sup>⑤</sup>由于历史传统，中共允许该党继续保留过去的某些组织形式。该党由四个部分组成：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这是该组织的原初形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三民主义促进会\*；第四部分与上述各组织没有历史联系，其成员复杂，例如，有的以前还曾是帝国主义的帮从。然而，除此之外真正富有意义的是这些组织结构问题。在民主党派原有“骨干”不足的地方，就由共产党来补充新鲜血液。例如，李维汉的兄弟李俊龙加入民革并很快成为民革中央委员。<sup>⑥</sup>民革还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个部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传部。该党成员经由宣传部听取国家对他们的要求，其中最起码的要求之一便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到1950年底，各民主党派都经过了彻底整顿，以适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已经有几年没有发展新成员了，经过整顿以后，现在可以恢复这项工作了。但是，成员的来源受到某些特殊规定的限制。为了有利于改造，周恩来总理作出安排，允许每个民主党派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内发展新成员。在这个“势力范围”体系中，一个党派不得涉足其他党派的范围——至少不能涉足中共的范围。民主党派将自己限定在那些被认为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当中，即限定在这个提

---

\* 应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译者注。

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尤其在政治上不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成份内。但也不是任何一名资产阶级分子都可以吸收为民主党派成员。相反，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各民主党派只能将其活动限制在这个阶级的某一部分范围内。作出这种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

各民主党派都保留了原有成员而没有对他们进行清洗。因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仍然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原属于三个党派的人和原国民党员算作自己的成员。但是，新发展的成员必须有固定职业。就民革而言，其成员通常必须是在政府中任职。<sup>⑦</sup>它也可以吸收一些适当的人物诸如参加过土地改革或抗美援朝的人加入其组织。除职业要求外，非大中城市的居民以及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般也不能加入民革。

有四个民主党派被界定为知识分子的党派。它们所属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被恰当地看作是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的人——通常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们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却不一定拥有资产。民盟是这个阶层最重要的政党，成员最多，其中大部分可以划定为“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一定文化和技术专长的人。现在，民盟可在文化教育界发展成员，重点是大学教授、学校教师、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它不能主动到政府职员中发展成员，尤其不能在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外事部门发展。

另外三个“知识分子”党派规模较小，其活动方式和民盟一样。它们的发展范围界限不很明确。起初，每个党派都可以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中发展成员。<sup>⑧</sup>农工民主党就曾允许在一切有职业的人当中发展成员，只有现役军人除



外；后来才逐渐强调发展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在医生和与大众医疗有关联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把发展成员的重点逐渐放在中、小学教师上。小党派九三学社则在有成就的学者，科学家和其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发展成员。

虽然上述党派不排除发展工商界人士，但也不主动地去发展他们。章伯钧（同属民盟和农工党）声称：“根据我们统一战线的任务，没必要再接纳工商界人士。”<sup>⑨</sup>理由是他们已有自己的组织——民主建国会。据主任委员黄炎培讲，1945年5月26日，即共产党接管上海两天以后，周恩来就作出指示，指出民建的主要职责是“团结和教育爱国的实业家和商人。”<sup>⑩</sup>该会将从民族资产阶级中选择一些人充实其队伍。按照这个政党的章程，这些人主要是“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这些入会的人中还有店主和工商业组织如商会中的积极分子。为了推进民建的工作，还“适当吸收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与资本家不同）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和其他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sup>⑪</sup>和民盟受发展“重点”的限制不同，民建发展会员没有任何地域上有限制。事实上，在民建章程中还专门有一条规定，要在没人发展过的地方建立组织。据悉，仅在1951年民建成员就增加了两三倍。<sup>⑫</sup>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建从原来几乎一无所有而一跃发展成第三大民主党派。民建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劝导”工商业者把他们的企业移交给国家。<sup>⑬</sup>

显而易见，这些党派都不再是“民主党派”这个概念通

常所表征的那种政治党派。它们的目的是不是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国家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特权，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民主党派当然也不能设想为反对党，他们并不代表各自成员的真正利益，而仅代表共产党为这些人限定的“合法利益”。后来，《人民日报》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作出了相当直率的说明：“它们不应当反映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这部分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不应当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与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sup>④</sup>但是，反过来说，民主党派又是政党。虽然不要求它们对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什么影响，但共产党和政府上层所做出的决策却会对民主党派成员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也许，唯其属于民主党派，才至于如此吧！

尽管中国共产党让这些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这些党派存在本身起到了另外的宣传作用。统一战线不仅是做给国内看的，而且也是做给海外看的，这才是真正所考虑的。民盟的一位发言人在谈到中国人民对一党专政的厌恶态度时指出，党在早期是纯正的，而且并不总犯错误。共产党必须做出某种和解的姿态，尤其对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因为这部分人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们对社会主义这块特殊的招牌并不完全同情。

同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还对那些非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边疆地区尽可能施加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台湾问题。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声称“和平解放”这个岛屿。就是说，按照这种方式，如果蒋家王朝妥协的话，那么，蒋氏和其他官员就会在北京政府中得到一定职位。尤

其民革的发言人积极规劝其前国民党兄弟正确对待这一建议<sup>⑮</sup>，然而得到的回应却寥寥。<sup>⑯</sup>

此外，民主党派的存在还使人们想起毛泽东和刘少奇曾极力倡导与中国毗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努力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要是中共破坏了统一战线，哪怕是名义上的，都会由于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化而损害其他共产党对毛、刘初期战略的学习。

最后，中共统一战线一直是针对海外华人的。在这些海外华人中多数已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多党政治体制。<sup>⑰</sup>

## 民主党派在政府中的活动

如前所述，民主党派有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人民政协本身并不是有效的决策机构，它仅仅为宣传党的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部宪法的序言中一般都提到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但是，在这些文件的主体部分却对它们避而不谈。在中国现行宪法（1982年）的“国家机构”这部分就没有提及它们。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标志人民政协失去了原先的立法职能。随着立法职能大部分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人民政协就不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而仅仅是一种迎合中共意愿的组织。正如刘少奇1954年所讲到的：

“有些人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和任务的规定。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在宪法序言中可以不作这样的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它曾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种职权今后当然不再需要它行使，但是它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既然它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各团体，将经过协商，自行作出有关这个组织的各种规定。”<sup>⑧</sup>

因此，人民政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常是统一战线各构成单位借以表达其赞成中共路线的场所。共产党在政协中的代表人数最多，尽管这并不等于他们就占多数。比较典型的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政协的有40名，三个最重要的民主党派各有25名。到50年代中期，这四个政党加上其他几个较小的党派在政协中总共有375名代表。<sup>⑨</sup>显然，如果哪一个民主党派事先不表示拥护共产党，那就不会让它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不要说在其全国委员会中占有席位了。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也有非共产党人士。不过，在那里有时很难弄清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不是作为本人所在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到5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中民盟代表可能有82名，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则更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有668名代表。<sup>⑩</sup>当然，在全国人大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意味着对国家事务就有真正的发言权。

各省和地方各级、政协人大都按照中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有时，虽然中共在人大中的代表不超过半数，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政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民主党派手中。<sup>⑪</sup>

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了共产党国家所通常采用的方法



（虽然近年来增加了些自由度）。按照50年代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先由中共列出候选人名单（不标明党派身份），然后交由全体选民进行选举。这个制度一直颇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欢迎。一位民盟成员说：“我们首先进行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作为一个民盟成员，我提出的建议，事先都经过讨论，以免引起群众的不满。如果事先不经过协议，选举时大家就会争论不休。这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民的钱财，此外，还容易让富人施加影响。”<sup>②</sup>

1953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这个制度“将极大地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全面贯彻国家总路线将起极大的促进作用。”民革中央还要求其地方组织“动员全体成员，特别是那些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成员，在地方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参加这场选举运动。”<sup>③</sup>可见，民主党派的参与意识受到鼓励。不过，民主党派并不因此而能够左右共产党的行动。

共产党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中有许多杰出的人才，他们可以在国家的管理方面作出成绩。虽然这些人在政府中安排了一定职务，但直到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仍被排除在共产党之外，以免玷污了党的队伍。因此，让这些人加入民主党派更合适些。非共产党人士——多数为民主党派成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中担任了副委员长职务；<sup>④</sup>在50年代还有一些人在政府中当了部长。这些部门通常属于经济管理部门，诸如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邮电部、林业部、农垦部和水利部等。此外，著名的民盟领导人史良（卒于1985年）曾担任司法部部长直到1959年该部被撤销时为止。民主党派成员还在其他部门如内务部、财政部、

贸易部、能源部和劳动部担任副部长。也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却参与了起草宪法和制定各种法规、法令的工作。<sup>②5</sup>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强调党与党外人士在政府中合作共事的必要性。这也是当时李维汉的讲话中经常谈到的话题。早在1951年4月，李维汉就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非共产党员表示，他们甚愿靠近共产党，但共产党员对他们不够热情和积极，这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应请各部门共产党的负责同志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改进。”<sup>②6</sup>周恩来在1956年1月14日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关于这篇讲话，将在后面一章加以论述。

50年代经常强调这个问题，这本身就表明实现真正的合作共事是很难的。当然，大家不能只看到这一点。1957年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也表明，非共产党人士在努力开展自己的工作时经常遇到阻力。“百花齐放”问题将放在后面谈，不过，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非党政府工作人员对一些困难所作的抱怨。例如，民主党派反映最多的是，他们有时被委以承受不了的过多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作只好由其他人来干——通常是由共产党员去干。事实上，几乎所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民主党派干部发现，共产党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事先都未与他们协商。即使制定决策的机关中有民主党派干部，那他们也只是作为“客人”参与而已。尽管行政干部的职责是执行既定政策，但民主党派干部也常常缺乏有效执行这些决策的权威。共产党的人士认为，民主党派的从属地位主要是相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言的。这使民主党派从中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希望它们怎么做。在政府

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常常被忽视。有关带有指导性的文件经常是保密的，而且只有党员可以看到。如果非党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而有时导致他们犯错误的话，那么，这很难说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因为这样工作上的失误而遭到责难。

因此，政府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并非总与共产党领导人的期望相吻合。这肯定使民主党派感到失望。

## 运 动 与 改 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几年里，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变革中国社会。有些措施是十分粗暴的。许多人包括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因此丢掉了性命。<sup>⑳</sup>但是，更常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运动和阶级改造。采用这些手段与采用较温和的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尽管对象和方法有所区别。群众运动的目标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民主党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sup>㉑</sup>每一次改造则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这里重要的是对资产阶级的改造。

民主党派被迫参加的第一场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当1951年政府发出“六一”号召，要求发扬爱国主义、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后，各民主党派作出了积极反应。民盟把这场运动看作是“中心任务”，号召全体盟员“积极捐献，保证捐献工作的顺利完成”。<sup>㉒</sup>其他民主党派也作出了同样的努力。<sup>㉓</sup>各民主党派还适时地发表了内容得体、引人注目的联合声明。显然，这些行动是接受了统战部的指示。有时，几个党派也联合发表声明，如1952年3月发表的谴责美国战争

行为的声明。<sup>③</sup>当各民主党派单独发表声明时，其内容即使不相同，但也是相似的。

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sup>②</sup>比较直接地触及到民主党派，可能给他们造成了更多的紧张。从1957年发表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党派在这场运动中遭受了许多痛苦。<sup>③</sup>特别是民建会员<sup>④</sup>在这场运动中幻想破灭了。共产党曾诱使这些工商业者们相信，他们大部分可免除“社会主义”的冲击，但是，在“五反”运动中，他们却认识到他们成了这场运动的重要目标。

从1951年春开始，民主党派成员就被告知，为了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就必须抛弃旧的思想方式。各民主党派组织则要帮助其成员完成这个思想改造。在以后的几年里，对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进行“团结和改造”成了民主党派活动的主题。1951年底，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制定了一个纲要，要求本盟成员参加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号召“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存在的各种错误的和甚至反动的思想。”一些大学里的民盟组织被荣幸地树立为思想改造的典型。在有些地方，民盟早已做出决定，要求“把教师的学习运动当作头等政治任务来抓。”<sup>⑤</sup>在此后的几年里，类似的说法不断出现。例如，迟至1956年1月，还出现了有关民盟帮助其成员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困难”的报道。<sup>⑥</sup>

在民革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根据新华社报道，“一些不良分子已得到清除，思想的再教育也在这个组织内开展起来。”民革认为，“这些成绩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民革中央的正确指导和民革全体成员的



共同努力。”<sup>⑳</sup>但是，这些成绩被夸大了，而且常常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正如一位民革成员在1957年所揭露的那样：

“有人说：‘官错了打衙役，衙役错了官打哩’。这可看出非党干部的苦闷。扣大帽子是常有的事，什么‘动机不纯’‘资产阶级作风’、‘危害革命事业’、‘破坏党的威信’等等非党干部戴上的就不少。于是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言论行动，抱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态度。”<sup>㉑</sup>

至于其他专业人员，他们对听命于不懂专业的领导非常不满。<sup>㉒</sup>

民主建国会积极开展工作，努力促进民族资产阶级改变过去存在的落后的思想倾向。它早在1951年1月就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似乎比其他党派要早几个月。<sup>㉓</sup>他们所采用的一般方法是“自我检查”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sup>㉔</sup>

上海制笔业人士努力改造自己的事迹得到广泛宣传。1956年1月，19位人士向当地民建支部领导呈交了他们自我改造的个人计划。新华社当时这样报道：

“这些计划经过六次讨论和修改……。个人改造包括个人的工作、学习、思想作风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的人计划在一年内学完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联共党史；有的人决心每天早晨按时上班。他们保证互相监督，完成计划中的每一项内容。”<sup>㉕</sup>

民建并不总是成功地改变自己成员的思想。我们了解到，在“百花齐放”时期，许多工商业者认为他们的企业是被骗去的，因而要求得到赔偿。他们的管理技术也基本上被

闲置在一边，对此，他们也很不满意。<sup>④</sup>

尽管如此，对这些人的改造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成功一些。1957年解除压制以后，在被改造的对象中“资产阶级”倾向表现最严重的是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对此无法做出精确的估价，但却可以从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已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们在1956年曾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共产党鼓励的、1957年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就是以这几次谈话所作的分析为依据的。

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做了两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一个是1月14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周对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人谈到，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同他们的进一步合作。现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周也感到有必要把握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分子不足45%；落后分子占10%；还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其余部分则属于“中间分子”。他们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进程中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们还不够进步，还需要进一步接受教育。周的“讲话”一些内容必定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在讲话中，周间接地暗示了要对西方知识予以更多的尊重。他还要求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不要过份地依赖苏联<sup>⑤</sup>。这位总理含蓄地指出，知识分子应受到尊重，即使他（或她）的政治观点可能落后。即使对那些在思想上坚持自己错误的人，“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sup>⑥</sup>

两周以后，周又在政协的一个单位发表了讲话。这一次，他不仅为知识分子讲了一些好话，而且还对民主党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已基本调动起来。在这方面，民主党派做了大量工作。”<sup>⑩</sup>当然，这并不是知识分子最想听到的那种赞扬，但毕竟比没有这种评价要强。在这两次讲话中，周发表了一些与左派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很难确切地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的态度是宽容的，其论述是新颖的、有意义的。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李维汉在谈到资产阶级及其所取得的进步时，也表达了乐观的看法。他说，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且重申了周恩来关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资本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与工人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洋溢着社会主义“共同劳动”精神的关系。<sup>⑪</sup>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放松对他们的改造了。因为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资本主义残余依然存在。

刘少奇同样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成为新社会的优秀公民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但是，他对民主党派却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民主党派在调动各自所联系的那部分人的积极性方面，比共产党做得还好。他在评价1956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时指出，民主党派的工作重点不应放在对其成员的改造方面，而应放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方面。他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许多重要因素就调动不起来。当然，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单枪匹马地

干，也不可能调动那么多的人。我们调动了一部分，你们调动了另一部分。”<sup>④⑧</sup>

尽管一些领导有时不太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但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人们却不会忘掉，并且总有人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56年3月3日《光明日报》指出：“民主党派应当督促自己的成员，积极起来并且帮助群众参加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做好这一工作，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有很大作用。”<sup>④⑨</sup>

民主党派是由这样一些人（很少有妇女）组成的，其中有些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有些人被共产党认为会很快取得“进步”。民主党派不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甚至也不代表其中的一个“横断面”。相反，用50年代常用的一个中国术语来表达，民主党派就只是由一些“骨干分子”所组成的；而这些“骨干分子”可以带动整个社会阶层向左转。

民主党派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主性，早已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尽管他们与共产党建立了“协商”关系，但在1956年，一位民盟领导人竟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民主党派能够影响共产党，促使共产党修改对某一工程的决策。<sup>⑤⑩</sup>民主党派成员所能做的只是“响应号召”；其影响力之小，小到经常连会议都不能参加，而且使人对民主党派感到厌倦和多余。<sup>⑤⑪</sup>不过，情况在发生变化。

#### 注释：

①唐纳德·W·克莱恩，安妮·B·克拉克著：《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李曾用名罗迈。

②只有特别大的支部才下设基层组织。

③因为民主党派很少有女成员（见第七章，注释<sup>⑤⑫</sup>），



所以本书将使用阳性名词。

④1983年修改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

⑤关于民主党派经费，见第7章。

⑥李俊龙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国务院工作。以后他又成为民革中央常委，但在50年代后期被打成了“右派”。

⑦虽然，在正常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不能加入民主党派，但有时候可以加入民革。

⑧详见莱曼·P·范斯莱克著：《敌人与朋友》，第214页。

⑨195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农工党主席章伯钧也是民盟的重要人物。

⑩黄炎培：《80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⑪天津《大公报》，1955年4月14日。引文虽出自1955年的民主建国会章程，但发展会员的方针一直没有变。一个人同时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主党派成员并不罕见。见新华社1957年5月8日及8月10日讯。此外，还有的共产党员秘密加入了民主党派（新华社1957年7月7日讯）。民主党派的成员未经特别许可不得退党。这些问题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

⑫新华社1951年2月3日讯。

⑬《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第9—10页、31—34页、51页、52页。民主建国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协助对会员的管理和改造。

⑭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⑮较早的例子，见新华社1956年2月29日讯。李济深指出：与“我党”目标有联系的另一个党派是台湾民主自治同

盟。

①⑥有关卫立煌的情况，见新华社1955年3月16日和17日讯。新近背叛国民党的著名人物有李宗仁和马璧。

①⑦另一个党派——致公党在北京政府和海外华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①⑧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①⑨《中国大陆杂志精华》，第87期第9页，李济深：《我的党》，新华社1956年3月27日讯。

②⑩新华社1957年3月4日讯，《中国大陆新闻观察》第1484期等。

②⑪1955年5月14日《新湖南报》，新华社1957年1月9日讯。

②⑫引自威廉·斯蒂文森著：《华人听闻的消息——红色中国见闻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版，第134页。

②⑬新华社1953年11月22日讯。

②⑭但没有人任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关于这一点，可见储安平的《请允许我进一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都是1954年开始设立的。在这之前，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中有几位非党的副主席。

②⑮例如，九三学社的一位法学家王之相参加了宪法、刑法及其他法律的起草工作。新华社1986年1月29日讯。

②⑯李维汉：《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②⑰关于民革人士周一祥（译音）被处死一案，见陈鹏：

《一桩30年的冤案》。

②8 50年代，民主党派在下列各次运动中都是运动的对象：土地改革运动（1950—1953年）；抗美援朝运动（1950—1953年）；“三反”（1951—1952年）和“五反”运动（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1952—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动（1953—1954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5—1956年）；全国整风运动（1957—1958年）；交心运动（1958年）。

②9 新华社1951年11月29日、30日讯。

③0 资料来源见詹姆斯·D·西摩著：《共产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③1 新华社1952年3月9日讯。

③2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包括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非法窃取国家情报。

③3 资料来源见西摩著：《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③4 同上。

③5 新华社1951年11月29日、30日讯。

③6 柯尔比：《当代中国》，香港，1958年版。

③7 新华社1953年1月20日讯。

③8 1957年5月26日《光明日报》。

③9 关于这个问题，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有自己的看法。见麦克法夸尔著：《百花》，第85、87、100、105、109页。

④0 《人民消息》1955年。

④1 资料来源见西摩《共产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④②同上。

④③关于民建的鸣放问题，见麦克法夸尔著：《百花》第198、204和206页。

④④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⑤同上。周还希望把更多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来。

④⑥新华社1956年1月30日讯。

④⑦李维汉：《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

④⑧引自后来批判刘的一篇文章，见1967年6月29日《工人日报》。

④⑨1956年3月2日《光明日报》。

④⑩理查德·休斯在《远东经济评论》（1978年1月20日）中复述了萨空了在1956年或1957年的观点。萨空了要求对工程作详细的论证，他说：“有这么多的细节。你们应当同我们协商，听取我们的意见……在方针路线方面，共产党不会发生错误，一点也不会，但在细节问题上却需要我们一起搞清楚。”

④⑪引自麦克法夸尔著：《百花》第99页。



## 第四章 转折之年—1956

1956年是民主党派的历史中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共产党试图确定这些党派的作用，并为它们的存在寻找理论依据。这是自1945年以来在这些方面所做的第一次认真的努力。人们期待这次努力的成果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持久坚持下去。尽管在1957年和“文革”期间它多次受到严重冲击，但毕竟还是坚持下来了。

1956年，重新评价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必要的，因为在这一年，国内发生了明显的转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实现”。虽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阶级也依然存在，但这一年仍被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由于国家实际上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可以说“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sup>①</sup>然而并不能由此认为，资产阶级必将宣告灭亡，其“政党”也必将被取消。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民主党派存在的新的基础来源于这样一个假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已被消灭，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仍然存在。这些党派所起的新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句不断重复的短语最初是在1956年夏流传开的。正如一位作者写道：这个概念，“肯定了民主党派在团结和动员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反对国内外敌

人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sup>②</sup>不仅如此，这还使民主党派确信，它们并不伴随资产阶级的灭亡而灭亡；而且给了他们一线希望——它们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一些真正的影响。

既然民主党派是由资产阶级不同成份所组成的，而其阶级成员又可望不久即完成自我改造，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些民主党派的继续存在呢？对此，在“长期共存”刚提出后的几个月内尚无答案，因而可能在各党派中引起了某种不安。民主党派人士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在学习会上讨论该问题。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刘说：“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改造他们。”<sup>③</sup>

刘是在9月15日向代表大会说这番话的。10天以后，李维汉又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党的主张。李解释说，思想的变化常常落后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资产阶级就是如此。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其成员身上继续存在，因此，仍需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sup>④</sup>

各民主党派中央要求各自的成员学习这次大会的文件。据报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欢欣鼓舞”，要求所属各级组织开展全面讨论。<sup>⑤</sup>其它党派也都热情很高，竞相仿效。<sup>⑥</sup>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必定也有疑惑：“长期”共存究竟共存多久？李维汉只是简单说道：“很长一段时间”，其

他人的回答也大体如此。然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一样终究也会消亡的。<sup>①</sup>当时已有某些暗示——虽然不是来自党的上层理论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将同时消亡。同年7月，《人民日报》提出：“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sup>②</sup>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一位作家在党的官方杂志《学习》上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生死相依”的关系。<sup>③</sup>

虽然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的思想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提出“互相监督”的思想却是一个里程碑。这是共产党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指导这样一个原则的特殊运用；在毛的早期思想中就已蕴涵了这一原则。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时被看作合法群众的一部分，而且在某些方面被看作是最有经验的一部分。李维汉自党的八大以来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人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和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需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这样，就需要资产阶级人士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李答应要使他们真正有事可做，并且有职有权地去开展工作；同时提醒各部门的共产党员，应当“经过适当的方式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sup>④</sup>

开展“互相监督”也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中共党员的不重视，而且也由于缺乏一个借以实行监督的合适的机构。可以想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许可以履行这种职能。李维汉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使它的活动更加充实和活跃起来。”<sup>⑤</sup>

其实，政协中的民主党派除了附和共产党外，并不被鼓励去做别的什么事情。<sup>⑫</sup>因此，非党人士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互不相干的行政职位上发挥作用。

当时，民主党派要想确切了解共产党的意图是不容易的。不过，在事后改变共产党人对颁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态度却是可能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是，确信资产阶级正在进步；它正在变化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个别不适应者也能够加以控制。可以认为，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成员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有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势必会接受这部分人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批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引起反对意见。相反，提出该论断本身就意味着相信不会出现反对意见。

## 组织变化和成员发展

1949年前后，各民主党派人数少，规模常不确定，并且日益缩小，成员总共才几万人。<sup>⑬</sup>1950年中，它们获准发展。其中成员增长最多的是民建。1945至1955年间，民建由一个小党派一下子扩大了40倍。据说，到1955年民革增长了两倍半。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增长的比例不大。不过，在1950至1953年间它已经增加了276%（当时正有许多自由人士被开除出盟）；到1956年7月，它扩大了三倍半。在此期间，其他党派也都有所发展。<sup>⑭</sup>

这样，民主党派在1951年至1956年期间成员总数逐渐发展到近10万人，无疑超出了这些党派在40年代末的规模。当然，这几年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尽管很快，但还不致于从根



本上改变它们的性质，党派人数的增加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毋庸讳言，政策总是由共产党来制定，以确保各民主党派的面貌保持稳定。然而，1956年至1957年夏，形势起了变化。在此期间，共产党放松了对民主党派的控制，并且在某些方面，那些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占了上风。

在谈论民主党派成员中发生的变化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组织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各种形式。在民盟，章伯钧和罗隆基组织了四个小组，这些小组后来被共产党认定有“危害”于民盟。<sup>⑮</sup>据说许德珩在九三学社里搞的变革“严重破坏了该组织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导致脱离现实、脱离群众。”<sup>⑯</sup>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那里，被称为“右派”的人试图控制党组织，<sup>⑰</sup>并且建立了所谓的反党集团。<sup>⑱</sup>

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对自己党派成员的质变起了作用。例如，罗隆基后来承认，民盟过于强调了“吸收那些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加入民盟，从而导致民盟中这些成分的骤增。”<sup>⑲</sup>或者像李维汉所说的那样，民建“有人曲解了主要从中上层人士中发展成员的原则，想让大资本家掌握和控制这个组织。”<sup>⑳</sup>

民主党派内部在制定组织发展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那些想按共产党的意图办事的人（总有许多这样的人）以外，有的人试图打破职业范围的限制去吸收成员，而另外一些人则想以一种缓和的方式继续这样发展。章伯钧即属于后者。他想建立一个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联盟，这个非共产党的联盟，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党。<sup>㉑</sup>

龙云也赞成这样做。<sup>②</sup> 罗隆基则明确主张把民盟、九三学社、农工党和民进合并成一个党，因为这四个党派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共产党内部曾经研究过这个计划。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加强非共产党势力的力量。

几个民主党派虽然没有合并成，但是扩展民主党派的努力却是有成效的。章伯钧甚至期望民主党派成员的总数要达到几百万。<sup>③</sup> 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期望每一个民主党派都吸收几十万成员，几个民主党派就可以吸收一二百万成员。我还提出把我们的组织扩大到县一级，并建议各民主党派就县级发展成员的问题进行协商。我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将得到重新评价，它们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sup>④</sup>

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抱有同感。黄琪翔在给农工民主党天津分部（无疑也适用于其他地方）的一封信中，敦促他们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组织。<sup>⑤</sup> 九三中央通知地方组织“在发展社员的工作中不必事事都向地方中共党委请示。”<sup>⑥</sup> 有迹象表明，在此之前共产党已决定了由什么人加入民主党派。

虽然手头的资料有限（而且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但也表明了一些党派激进分子成员的增加发生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九三的资料最全，在此期间该党成员增加了235%，相当于民革和民盟增加的总数。九三学社甚至吸收了一些工人，而工人本属于共产党发展的对象。<sup>⑦</sup> 到1957年中，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已发展到90多个，而在一年前还只有18个。相比之下，这种增长可谓是惊人的。据《光明日报》报道：在杭州，九三成员从5人增至183人；在济南，从4人

增至180人；在天津，九三成员增加了9倍；在唐山，增加了20倍。<sup>⑳</sup>（有趣的是，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九三学社的发展，而且表明在1956年一些地区九三学社的组织已濒临灭绝。）地方民主党派支部还常常在那些甚至及有省级组织的地方建立起来。<sup>㉑</sup>

农工党虽然发展得没这么快，但它和九三一样，采取了相同的发展模式。它开始吸收医卫界以外的人士，这种做法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而如今却把范围甚至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据说农工党主席章伯钧想使其成员增加到一万人。<sup>㉒</sup>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天津加入农工党比购买一张电影票还容易。在武汉，农工党吸收了300名新成员，相当于原有成员的一半。<sup>㉓</sup>

九三和农工与民盟、民革、民建相比，始终是两个比较小的党派。虽然这些较大的党派也有所发展，但发展幅度却相对小一些，下面是几个来自地方组织的统计数字。在上海，在章伯钧和罗隆基政策的影响下，民盟从967人（1956年初）增至3384人（1957年8月）。<sup>㉔</sup>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民盟的实际发展不如他们设想的那么快。<sup>㉕</sup>其它两个较大的民主党派的发展情况不太清楚，但有些片断资料表明它们实际人数还是有所增加的。在武汉，民革人数与1956年初相比增加了50%。同样在武汉，民建成员从不足400人增至1200多人。<sup>㉖</sup>

总之，几个较小的民主党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与其早期发展不同。这是和三个大党派不一样的。三个大党派在发展规模上或多或少是沿着50年代初的路子进行的。

当然，这些党派如果不了解共产党就不会取得这样的发

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改变了其发展成员的性质）。是共产党低估了所发生的事吗？或者它甚至可能支持和鼓励这种发展？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后一种可能性起码还不应排除。这些都发生在“百花齐放”和长期共存的学说发表以后，可以说几乎是个巧合。也许有些共产党员认识到统一战线正在变成一个空架子，而民主党派要还想发挥点作用的话，那么就必须扩大队伍。如果预见到民主党派有可能发展成对立面的话，或许一些共产党人就会确定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让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分子加入民主党派。如果共产党领导人真心希望已经扩大的民主党派继续沿着“进步路线”前进，他们显然就不会认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人士仍基本不同情共产主义；而且也不会认为，民主党派的发展要是没有相应的外部控制的加强，就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注释：**

①史汝刚（译音）：《“长期共存”之我见》。

②胡西园（译音）：《我们为什么实行“长期共存”的方针》。

③刘少奇：《政治报告》。

④李维汉：《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⑤1956年9月15日《光明日报》。

⑥出处同上。新华社1956年9月1日讯。

⑦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⑧195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⑨顾执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⑩李维汉：《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⑪同上。

⑫应政府之请，全国政协在1955年秋和1957年春之间组织了视察组。

⑬1949年前民主党派规模尚不清楚。斯坦因在他的书中（第372页）指出，民盟的成员可能已接近10万人，但是新中国的新闻机构估计1949年民主党派的总人数为2万人。

⑭资料来源见西摩：《共产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⑮同上。

⑯新华社，1957年8月23日讯。

⑰1957年8月9日《光明日报》。

⑱新华社，1957年8月10日讯。

⑲罗隆基。

⑳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

㉑资料来源见西摩：《共产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㉒新华社，1957年6月25日讯。

㉓新华社，1957年6月15日讯。

㉔章伯钧：《我的检查》。

㉕新华社，1957年12月14日讯。

㉖闻一文（译音）：《“有害的发展”败坏了九三学社》，1957年8月29日《光明日报》。

㉗新华社，1957年8月28日讯。

㉘闻一文：《“有害的发展”败坏了九三学社》。

㉙哈尔滨的民进组织建立于1957年；而黑龙江省约20年没有省一级的民进组织。哈尔滨广播电台，1983年10月28

日。

③⑩这里与章的前述说法相矛盾，“一万”也许意指“大量”。

③⑪新华社，1957年8月16日讯。

③⑫新华社，1957年2月22日讯。

③⑬新华社，1957年8月15日讯。

③⑭有人详细告诉我，民盟的总人数在1957年12月是33188人。我想这可能是在几千人被开除后的数字。见本书第五章，注释⑦⑥。

## 第五章 民主党派与“百花齐放”(1957)

“百花齐放”——暂时减缓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对民主党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利用这一机会批评共产党的人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百花齐放”的活动，通过民主党派的新闻媒介寻求公开性。一些人甚至试图利用民主党派获得政治利益，以改变这些组织的性质，使他们再次成为真正的政党。

### “争鸣”——根本宗旨

很难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允许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但在1956年上半年，人们已可觉察到中共态度上的变化。在此之前，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是限制、改造和利用。这成为1955年12月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会议的主要议题。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还不明确。

然而，一个月以后，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表现出一种较为和缓的态度。那时，周情愿接受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而不愿强迫他们立即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者。<sup>①</sup>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共上层无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在一次令人感兴趣的秘密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了多党制的优点。他认为有三分之二的党政干部好象对民主党派并不习惯。而他自己则对民主党派似乎有一种奇特而真诚的尊重：我们有几

个民主党派，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我们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因为我们要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中国不存在正式的反党派〔反对党〕因为所有民主党派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毛指出，在国内战争、朝鲜战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些人态度暧昧，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他们的爱国心常常使他们从反对派变成支持者。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善，我们必须允许民主党派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是合理的，不管来自何方，我们都应该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和社会主义，都是有益的。②

5月2日，毛泽东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个半公开的报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其中有一些非党人士参加），毛在讲话中借用古代中国历史上“百花”一词，阐述了他关于放宽限制的设想。③这次谈话没有发表，但其主要内容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该月晚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作了阐述。④

陆承认他的讲话是秉承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精神。总的意思是：政治上的各抒己见对中国是有利的。但他的讲话又不完全是受毛的委托。他讲到：“中共中央……已经指出，在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讨论学术问题时，要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及对知识分子既联合又改造的政策”。由于这一提示，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整整犹豫了近一年才认真对待“百花齐放”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⑤

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一概念仍屡屡出现。1956年夏天民主党派召开的各种会议上都提到了它。与此同时，对长期共存的讨论也很活跃。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又重申了



这一思想。⑥“百花齐放”还是1957年2月毛泽东重要讲话的主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象毛的1956年5月讲话一样，也是在秘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非党人士听了这个讲话，但讲话没有马上公开发表。

毛在很多年前就首次阐述了他关于“矛盾”的思想。⑦他的这一思想不同于苏联的观念，而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密切联系。毛认为辩证的宇宙观在古代的东方和西方都可追溯到——例如中国的“阴”“阳”学说中就已存在。“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⑧黑格尔对辩证法确有“重要的贡献，”但真正的飞跃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毛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来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这些是极端的例子，在对待中间情况时，则不能教条地照搬。“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⑨再有，要分清矛盾和“对抗”的差别。后者而不是前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消失。

毛在1957年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目前存在着两种矛盾：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⑩目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这就需要改变国内阶级斗争的策略。非革命力

量可以公开得以处理；说服的方法必将取代使用暴力。

毛鼓励知识分子更加直言不讳，他觉得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sup>⑪</sup>他认为言论更加自由将有利于“艺术繁荣和科学进步，”但他的大部分讲话具有政治含义。毛提出“百花齐放”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活力。他把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比作种牛痘，一个人在接种了牛痘疫苗后，才能增强免疫力。当然，毛并不要顾怜反革命分子或“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但在“人民”内部（这一概念理所当然不包括反革命分子，尽管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不必禁止发表错误意见。“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sup>⑫</sup>这听起来好象是在重申西方自由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毛的确说到，他不能容忍压制思想的做法，他把它看作是解决矛盾的笨办法。但毛倡导的思想多元性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真理畅行无阻，思想迷误者自惭形秽。<sup>⑬</sup>

因此，“百花齐放”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落脚到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强调的“互相监督”上。<sup>⑭</sup>而且，在1957年5月，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的思想显示出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至今人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时要如此强调“互相监督”，而几乎忽略了毛思想的另一面——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向左靠拢。粗加分析，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百花齐放”只是利用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sup>⑮</sup>然而这就会假定1957年春天的事件是党所预期的。这种分析忽略了共产党人本质上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即认为知识分子正在

进步。这些看法可能是不真实的，这在毛的讲话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如果毛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就不可能在形势判断上犯这样一个普通的错误。因此当“百花齐放”最终使共产党重新处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支配地位时，这一历史事实就不应忽略这种可能性，即共产党的领导期望从“互相监督”中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而不是去推进他们更大的事业。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尽管在后来的两个月中共产党采取了一些行动并进一步确立了政策，但唯一值得关注的是共产党内部开展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在毛的二月讲话之后不久，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的。第一次整风（1942年）已过去了15年，党员人数已经增长了12倍多。一些党员应进一步进行思想和纪律的培养。特别是许多干部是游击战争中参军的庄稼汉，现在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他们需要向素质较高、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学习很多东西。

因此，1957年整风的特点是，它不完全局限于共产党内部，而是争取党外的帮助。为了这一目标，在5月8日，李维汉召集了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第一次座谈会。<sup>⑥</sup>正是在五月座谈会上，著名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提了出来。在第一次会议上，李维汉不仅声明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强调与会者可自由地批评共产党。<sup>⑦</sup>

这种批评很快就出现了。在五月座谈会上，在民主党派报刊上以及在民主党派的许多会议上都开展了对中共的批评。尽管一般注意到把批评矛头指向党员个人（而不是体



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批评。而且用可接受的语言，诸如“墙”和“沟”（在统一战线内部）以及“三大敌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来发泄不满，也不是说就没有意义。这样发言经常变成辛辣的讽刺，如当时章乃器说：“我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sup>⑮</sup>

经常的话题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不足。例如，在民革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钱昌照抱怨说：“个别中共党员骄傲自大，有时同他们交涉公务时，他们既不答复来信，也不回电话，只是当不断地提醒后，他才冷淡地回复你的问题。”<sup>⑯</sup> 还有一次，民建的胡子昂举了在工作安排和劳动报酬上不平等的例子。<sup>⑰</sup> 农工民主党一位成员怀疑中共党员是否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sup>⑱</sup>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抱怨，即党的权力太大，而政府的权力太小。照民革邵力子的说法，政府没有什么权力，因为它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一位民盟成员也认为党没有将自己与政府区分开来。党应该遵守“既有的法律、法规及制度。”<sup>⑲</sup> 然而通常还因为法制不健全而招致不满。人们指出，由于没有法规，因此老百姓不得不忍受党内“政治权贵”的压制。<sup>⑳</sup> 民革的李仁人（译音）说，除非健全法制，要不整风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成功。<sup>㉑</sup> 民盟成员杨青（译音）评论说，各级党员“常常藐视宪法。”他建议：“我主张从现在起，党委应无一例外地与宪法保持一致。党委既不能取代行政机关，更重要的是不能取代司法机关。在没有搞清楚有关事实前，司法部门不能作出判决。”<sup>㉒</sup>

正如第三章所说，党的影响力太大也制约了政府中非党



官员的作用。一位民盟成员呼吁“要以制度保证非党人士正常地行使其权力。”<sup>②6</sup>另一位民盟成员指出，问题不在于民主党派人士有没有职位，而在于他们不能“拥有与其职位相称的权力。”<sup>②7</sup>经常有人说：非党官员得不到他们工作所必需的信息。<sup>②8</sup>另外，担任要职的人有时又有许多其它虚职。但资深的民革成员蔡廷锴认为，就共产党员而言，根本的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sup>②9</sup>

显然，政府内部党与非党官员的不协调关系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而且在各个基层部门也有所表现。邵力子说：“一般群众认为县一级政协几乎没什么用。中共县委……行使更大的权力。”<sup>③0</sup>民革的张治中指出，统一战线在基层比在上层遭受的损害更大。确实，这几个星期以来，许多地方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都展开了争论。<sup>③1</sup>

由于民主党的队伍中有这么多大学教师，因此其成员抱怨学校的条件也就毫不奇怪了。最直率的大学教师要数兰州大学的陈时伟，他是当地“九三”学社的主委。陈坚持认为“大学不需要党委的领导。”他在“九三”会议及广播电台上都提倡，大学由教授来办。（尽管党可以在政策上起指导作用）。他称他所在的大学“死气沉沉。”他尖锐地批评大学当局既无能又冷漠，校长不但热情崇尚“农民革命”，而且武断地不愿要好的教授，因为好的教授不会听任摆布。<sup>③2</sup>（关于学术界的进一步争论，可参见附录一）

特别有趣的是三位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观点：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席兼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民盟副主席）、章乃器（民建副主席），章和罗两人在民盟的地位比其头衔更重要。1950年共产党改组民盟时，最高职位由驯良而又年长

的两位国务活动家——张澜和沈钧儒来担任。<sup>③</sup>但张澜于1955年去世，上了年纪的继任者沈钧儒作用有限，他实际上于1957年3月退休了。这样，领导民盟的责任大多落到两位较年轻的人身上。

章伯钧除了担任民主党派职务外，还是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光明日报》社长。由于章拥有民主党派和新闻工作的双重职务，所以当共产党在五月座谈会上放宽限制时，他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很显然，他希望看到民主党派更具有独立性，以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表白中所说的：“我很赞赏1956年‘十月事件’之后波兰的民主党派，因为他们有所作为。我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控制太严了。特别是对地方组织的控制更严。干部由党按自己的意志来挑选，而不顾我们的意见。在我看来，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的方针，民主党派似乎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sup>④</sup>

章因引爆了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不满情绪而受到责备。他当然对非中共党派的未来作用有自己的想法。他主张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上议院”，这样民主党派就可以制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一建议使许多人感到震惊。<sup>⑤</sup>

罗隆基这位受过美英教育的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956年被任命为林业部长。自1952年起他就是《光明日报》的领导成员，他试图使这一报纸成为民主党派的喉舌。1957年，他指出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不得不听任无产阶级队伍中小知识分子的摆布。尽管罗表示拥护共产党，但认为应更好地利用高级知识分子。“从英国回来的一些学者象

苦力一样地生活，从美国回来的一些学者摆起了香烟摊”。<sup>③⑥</sup>罗认为自己是一名“忠实的反对派。”中国政府确实很信任他，以至于派他代表中国参加于1957年6月在锡兰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因而，在反右运动开始时他不在国内，但他回来时恰临反右运动的高潮。

罗和章受到批判，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而且是由于他们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讲党运动。当然，他们否认了这一点。正如章7月份在农工民主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以良心保证，我既没有命令也没有暗示要向党进攻。”<sup>③⑦</sup>

章乃器除了担任民建副主席外，还是粮食部部长及全国人大代表。当他在五月座谈会上极力鼓动他的同僚大胆讲话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毫不迟疑地相信了他的意见。章乃器本人抨击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中的几个基本原则。他否认资产阶级具有所谓的两面性，他说这个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差别。<sup>③⑧</sup>甚至那些得到固定投资利息的人，并不必然就有剥削而仅是非劳动收入的受益者。<sup>③⑨</sup>章质疑资产阶级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说：改造是“教条主义”的。<sup>④①</sup>这意味着他抛弃了自己曾说过的再教育是民建存在的理由这一主张。<sup>④②</sup>后据披露，章乃器说过，就构成民建主体的那部分群众而言，“实业家和商人可能爱国，但他们不会热爱社会主义。”<sup>④③</sup>共产党人不应是幻想狂，“在争鸣中，不应害怕片面性，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但这不是惊恐的原因。”<sup>④④</sup>

民主党派的报刊在这几周步调趋于一致。这些出版物表面上代表民主党派，实际上一直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但这时，这些刊物如实地刊登了民主党派发言人的论点，突出的

是《光明日报》。其它民主党派的报刊杂志<sup>④</sup>和权威的共产党刊物也程度不同地登载类似内容。<sup>⑤</sup>

《光明日报》在40年代就是民盟的报纸，但1949年以后它开始面向所有民主党派。（通过充实其它党派成员和执行共产党路线。）编辑部成员中有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其中包括一些颇有独到见解的人。如前所述，章伯钧是该报社长。五月座谈会时该报主编是储安平。<sup>⑥</sup>从1956年开始，储安平的方针是不加“分析”就原文刊登所有言论。他任命几位作者为该报编辑，这几个人后来均被打成右派。<sup>⑦</sup>储和他的同事力求刊登更多的民主党派活动的消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信息，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类政党的活动。<sup>⑧</sup>此外，就象后来受指控的那样，他们还不加“分析”地刊登国外新闻社的消息。<sup>⑨</sup>

储怀疑民主党派应该在整风中帮助共产党的说法。他们愿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但力量太弱，作用有限：共产党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怎样协调（如何处理好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矛盾），怎样搞好党群关系，党怎样才能……尊重非党人士……党怎样才能更好地遵守自己作出的政治诺言，怎样以政德治国，怎样使包括杰出人士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本国人民各得其所。

储安平在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说道，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党天下”的思想。“我认为一个领导国家的党与一个拥有国家的党不是一回事……党要保持坚强有力并在政府中拥有要害位置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全国每一个单位，不论大小都必须要有—位党员；也不管事情大小，没有党员的点头就不能办，这是否太过份了？”<sup>⑩</sup>



毫不奇怪，共产党在1957年夏天首先要办的事是对《光明日报》的人事进行改组。

## 后 果

尽管没有作任何决议，民革的《团结报》在5月15日出版的那一期上登载了民革中央正在研究内部整风的消息。虽然共产党已决心对民主党派进行整风，但仍告知民革成员在做出有关的决定前，应集中精力帮助共产党整风。<sup>⑤</sup>民盟显然感到局势未明，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6月6日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见附录二），但为时太晚，以至不能改变其处境。两天以后，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

不久，各民主党派中央都宣布自己要进行一次整风。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得平静。在1957年的夏季和秋季，各民主党派的所有活动都受中共统战部的直接领导。“五月座谈会”结束之后，<sup>⑥</sup>民主党派领导层中那些曾抱怨过共产党的人，遇到了巨大的压力。许多一直保持沉默的民主党派人士开始对那些异己者施加组织压力了。

章伯钧是首先公开承认错误的民主党派要人之一。他在6月19日公开认了错，紧接着其他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姿态。章的语气是辩解性的，但很显然他尚未完全屈服。“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完全正确，即使他在讲这些话时认为是正确的。在经别人批评和提醒之后，人才能自我反省，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这对我有帮助。”他“可能”说过有损于党的话，削弱了党的领导，但实际上他

只是批评了一般的党员干部。此外，根据《人民日报》对章伯钧讲话所作的一番解释：

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他讲过政治设计问题，制订规划只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他们并不居于领导地位。他还在国务会议上讲过方法问题。从其政治立场来看，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倾向性。他不愿为自己辩护。他不想说违心的话。<sup>⑤③</sup>

两天后，章伯钧转而公开批评储安平，并保证《光明日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sup>⑤④</sup>章还没有来得及履行其诺言，就被解除了社长的职务。就在他讲话的同一天，他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sup>⑤⑤</sup>

章乃器陈述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包括大胆地驳回对他的攻击。<sup>⑤⑥</sup>他否认曾敌视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sup>⑤⑦</sup>他最后于7月17日承认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有一些不足，但他仍坚持自己从未反对过共产主义。批评他的人在他的过去历史上做文章，他被无情地指责为支持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者”。在以后的几年，他被撤销了包括民建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各种职务。<sup>⑤⑧</sup>

与此同时，民盟的另一派则设法唱主角。6月13日，民盟“中央委员会派”召开了会议，右派分子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批判。据《人民日报》报道，“所有发言的人都批判了民盟领导人所散布的错误观点……发言的人还一致要求民盟中央阐明自己对这些错误观点的立场，并呼吁……在思想上与这些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否则，他们就不能与共产党实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长期共存。”<sup>⑤⑨</sup>会议认为，几位民盟领

导人的自我批评不够深刻。

反右运动很快波及到省一级。北京市各基层组织有人发言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常委会会议，以阐明当前的形势，检视民盟的工作，并“改进其领导”。在上海，当地的一位民盟领导人因“坚持错误观点，进行反党活动”而受市委的谴责。新华社报道了天津、西安、广州、成都、重庆、吉林和苏州的类似活动。所有这些会议，包括在北京和上海召开的会议，都是在两天之内举行的。<sup>⑤⑩</sup>

6月18日，李济深指责民革领导人龙云发表过反苏观点。<sup>⑤⑪</sup>然而，现在人们清楚了，龙云只是有点超前。龙云首先对中苏结盟是否得当提出质疑。他抱怨苏联的贷款条件太苛刻，比不上美国对其盟国提供的贷款。另外，苏联应该分担朝鲜战争的费用。苏联占领军不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拆走东北的工厂；现在苏联应偿还这些设备。<sup>⑤⑫</sup>所有这些，龙云（及有同样想法的民主党派人士<sup>⑤⑬</sup>）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6月21日，九三学社宣布将在内部进行整风，并暂时中止吸收新成员。<sup>⑤⑭</sup>两天以后，民进也宣布，由于内部整风，从现在起停止发展新成员。<sup>⑤⑮</sup>尽管人数较多的其它党派中只有民革发了文件，但估计都有同样的计划。7月6日，民革宣布了整风将采取的形式。重点将放在省、市一级，各支部学习将要下发的文件，不再吸收新成员。要继续支持中共进行整风。<sup>⑤⑯</sup>

在党刊《学习》8月8日的那一期上有一篇徐道和（译音）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阐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他再次强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民主党

派毕竟是“资产阶级政党”，“掩饰这一区别将导致‘分享政权’和‘地位平等’的错误思想”。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各政党地位平等的资产阶级观点。<sup>⑥7</sup>

到8月，民主党派都在积极进行整风。不断有关于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人数的报道。根据8月9日《光明日报》的“最初统计”，民革成员中有100多名核心的右派分子。<sup>⑥8</sup>新华社在15日报道说民盟已陷入受右派分子控制的巨大危险之中；<sup>⑥9</sup>新华社在第二天又报道说，农工民主党内“混杂着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以至于处在瘫痪和瓦解的边缘。”原因主要是由于章伯钧推行了错误的政策。<sup>⑦0</sup>

当然，这些指责有许多夸大的成份。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各民主党派内部始终有两派，一派的思想不受约束，另一派则迁就共产党。<sup>⑦1</sup>地方上的民主党派组织常掌握在持不同政见的人手中。（在武汉，他们控制了民盟73个支部中的42个。）<sup>⑦2</sup>在其它地方，调和派可能占多数，但他们在1957年春一直审慎地保持沉默（或许是按旨行事）。到今年夏天，他们不再沉默了，这些非自由主义者猛烈抨击了自由主义者。例如吴晗批评了罗隆基，吴大琨则尖锐地责备了章乃器。民主党派的路线也常遭反对，如民盟的胡愈之就猛烈地抨击过农工民主党。<sup>⑦3</sup>同样地，一个我采访过的人回想起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物的过去，挑了不少毛病。这位自由派人物被看作是隐藏很深的民族主义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偏执狂，军阀的帮凶，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煽动反党情绪。鉴于他的过去，就不难理解他的行为。（跟我谈话的那个人现在的看法有点软化，但他仍坚信这位自由派一直很“自负”。）

由于民主党派“右”得厉害，共产党觉得应重新考虑对



民主党派的态度。正如8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

事实证明，民主党派一旦偏离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注定会迷失方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以及长期共存的可能性。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并使他们转向左派，孤立右派并使其分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是民主党派必须走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谈得上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sup>⑦</sup>

这一明确的左派立场表明了，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所谓的进步，（领导层对此曾很自豪）民主党派要进步，只有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57年的整个秋季，民主党派的错误不断被揭露出来。9月12日的《团结报》宣称民革中央总共132名委员中有20名是右派，在24个省一级委员中，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委员是右派。<sup>⑧</sup> 10月份，有报道说民盟成员中揭露出了2199名右派，其中包括各级领导。<sup>⑨</sup> 最终大约有6600名民盟成员（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被打成右派或遭到更坏的处置。<sup>⑩</sup>

9月份的下半月，5个民主党派在北京召开了整风工作会议。<sup>⑪</sup> 进行整风的指示不久就下发到地方机构。各支部按要求参加了整风。<sup>⑫</sup>

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的经历相当一致，并且所有事件似乎都是在李维汉主持工作时发生的。李维汉宣布了在地方案整风会议上应该解决的问题。在他的“八条”中有“社会的阶级基础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还要讨论其它问题（与“八条”不同）——例如，“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民建除讨论“八条”外，还附加了七条，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工商业者而言）<sup>⑬</sup>

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坦白交代在继续。11月29日，储安平“承认他对人民有罪，并立志悔过自新。”<sup>⑧①</sup>12月，罗隆基也作了一点坦白，但他说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不会承认某些指责。<sup>⑧②</sup>章伯钧作了中共可以接受的书面忏悔。<sup>⑧③</sup>

1958年1月，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解除了政府职务。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都失去了部长职务。<sup>⑧④</sup>那些不再担任民主党派领导职务的人员名单都被公布出来了；所有借“百花齐放”之机严厉批评共产党的人都在名单之列。<sup>⑧⑤</sup>

对发生在1957年6月以前的离心倾向的加剧作何解释？整个过程顺理成章，人们或许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百花齐放”只是共产党挖出不忠之人的计谋。但统一战线遭受了破坏，共产党政权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人认为“百花齐放”是特意用来减缓压力的，目的是保证中国不发生早一年秋天曾震撼东欧的类似事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存在这种真正的危险，在中国发展到需要施加压力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

形势发生逆转没有使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尽管“百花齐放”思想在领导层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得到广大支持，但它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军队的陈其同（译音）早在1月份就抱怨说，反对形式主义正蜕变为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的攻击。<sup>⑧⑥</sup>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允许资产阶级各派别拥有自主权，因为他们相信党在政治上是强大的，不怕实行这些政策。同时，据毛泽东称，这些政策会带来具体的利益。全世界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把暴力和压制视为必要的手段，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厌恶这些方法。党希望不依靠这些方法就可以实现

对资产阶级及所有社会团体的领导。这种希望落空后，党就毫不犹豫地重新使用这些方法。尽管毛泽东大大地丢了面子，但为他的错误付出全部代价的却是别人，其中包括民主党派成员。

批评毛的高层人物，著名的如刘少奇和彭真，很快通过这一事实，发现百花齐放是一场灾难。与毛泽东甚至邓小平不同，他们从不欣赏党接受党外人士批评的思想（不过他们确实赞成党内有更大的民主）。<sup>⑧</sup>有意思的是，他们选择吴晗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吴晗是彭真手下的副市长，是民主党派中最重要的反自由派人物。（他是北京市的民盟主委。）表面上，吴晗把矛头指向有自由倾向的民盟同僚，然而，正如中国政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事物的发展往往越出既有的轨道。他在1957年参与争论的主要点是罗隆基关于建立一个委员会重新审议50年代初肃反扩大化的主张。——毛有时似乎倾向于这一建议。<sup>⑨</sup>吴晗指责罗隆基对共产党的干部“缺乏信任”。同样，有关章伯钧评论党对教育机构的控制的新闻报导，也是针对毛泽东的，<sup>⑩</sup>到1958年，吴晗对毛主义者的指责更加明显，他对在教育 and 学术问题上数量重于质量的主张表示质疑。他反对改写中国历史，也反对引用不符合时代的社会政治概念。吴晗说，中国的历史学家具有实事求是写历史的优良传统。<sup>⑪</sup>

这样，在实行“百花齐放”之后不久，党内反对势力与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幸存者（反自由主义者）聚合起来，共同反毛。这种不协调的联盟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1965年以后，毛泽东才对这两部分人进行了报复。

## 注释：

①周恩来：《论知识分子的问题》。

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虽然这是1956年4月的讲话，但直到1965—1966年冬才公开发表）。

③指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21年）的“百家”，那时曾呈现文化多元化和文化繁荣景象。

④在这个过渡期，有三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部长。他们是罗隆基（林业部长），许德珩（水产部部长）和李烛尘（粮食工业部部长）。《光明日报》也号召开展更自由的讨论。哈罗德·C·金顿：《共产党中国的内部矛盾》，第5页。

⑤陆定一：《让所有鲜花一齐开放》。

⑥《新闻资料》第412、61页。

⑦毛泽东《矛盾论》一文的写作日期（官方认为是“1937年8月”），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它的写作肯定晚于这个时期，但毛泽东在1964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再次确认了这个时期。

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303页。

⑨同上书，第311页。

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67页。

⑪同上书，第786页。

⑫同上书，第787页。

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于1957年春末发表。它包括据以确定某种批评是否对国家有利的六条标准



的内容，这些标准的共同点是与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一致。一般认为，在2月份发表这个讲话时并没有提到上述内容。至于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对我们来说并不太重要，因为即使在最后确定的这个文本中，毛实际上也没有禁止那些认为不包括六条标准的看法。六条标准提供了判断是非的尺度。此外，即使在最初的讲话中不包含这六条标准，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限度。4月份，邓初民在《光明日报》撰文，概括出四个“方面”，要求不满现状者以此来约束自己。邓是一位民盟成员，他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如果毛一点也没有提出批评加以限制，那么，邓是不可能做出任何概括的。关于毛论述矛盾普遍性问题的同一讲话的两个不同版本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见金顿著《矛盾》，第20页。毛早期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思想，见《矛盾论》（1937年）。

⑭《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89—790页。

⑮这好象是G·F·哈德森所持的观点，他吸收了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下述内容：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是为了“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

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这似乎并不能证实哈德森所讲的。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回到1957年5月，去发现那些对党的路线不满的人。《人民日报》在事后已明确作出了合理的说明。

⑩这两次会议的日期是5月8日—16日和5月21日—6月2日；见下面注释⑫。

⑪新华社、1957年5月8日讯。可能在1957年春，一些高级官员在私下鼓动民主党派人士对党进行批评。尽管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已率先提出“百花齐放”，然而直到1957年春之前，几乎每一个人都非常小心谨慎。

⑫陈青（译音）：《驳章乃器〈我的自我检讨〉》。

⑬新华社，1957年6月3日讯。

⑭新华社，1957年5月19日讯。

⑮新华社，1957年6月8日讯。

⑯新华社，1957年6月6日讯。

⑰民盟成员杨青的用语。麦克法夸尔的《百花》第110页引述了该用语。

⑱新华社，1975年6月5日讯。

⑲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10页。

⑳新华社，1957年6月1日讯。

㉑新华社，1957年5月8日讯。

㉒新华社，1957年5月11日、6月20日讯。

㉓麦克法夸尔：《百花》第226页。

㉔新华社，1957年5月10日讯。

㉕亦见新华社1957年6月15日稿（毛被比做秦始皇、整个共产党被比做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关于处理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评论，见新华社1957年5月9日、6

月30日、6月15日讯；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及罗隆基：《我的初步检讨》。

③② 麦克法夸尔：《百花》。

③③ 肖、王：《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党派》第37页。亦见新华社1957年7月3日讯。

③④ 新华社，1957年7月3日讯。

③⑤ 有些人甚至比这走得更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执政。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23、227页。

③⑥ 希尔曼：《人名词典》第2卷，第437页。

③⑦ 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70页。

③⑧ 新华社，1957年7月4日讯。

③⑨ 章乃器：《关于帮助和引导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几个问题》。虽然章阐述的这一特点一直不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其关于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属于工人〔阶级〕的总的观点，却在80年代成了中共官方的路线。

④⑩ 新华社，1957年5月7日讯。

④⑪ 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报告》。

④⑫ 陈青：《驳》文。（章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

④⑬ 麦克法夸尔：《百花》第196页。

④⑭ 除《光明日报》外，还有其它一些出版物声称是为民主党派讲话。这些刊物中有：上海《文汇报》（见新华社1957年6月30日讯）和民盟主办的《争鸣》月刊（见《光明日报》1957年4月18、21、26日稿）。民革有《团结报》，还有各种通常称作《民革》的地方出版物（见新华社，1957年7月7日稿）。最后，民建办有《民讯》杂志。

④⑮ 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④⑥楚至少与两个民主党派有关系，他只是在1957年4月才得到这个职位。为了五月座谈会，他向各城市派了记者。

④⑦1957年6月21日《光明日报》。

④⑧章乃器：《我低头认罪》。

④⑨1957年6月21日《光明日报》。

④⑩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④⑪1957年5月15日《团结报》。

④⑫我所讲的五月座谈会于6月3日结束。另一次虽然抱同样目的的座谈会是6月8—19日举行的，而且这次会议宣布以后每两周举行一次这样的座谈会。然而，6月3日以后，各民主党派就不再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顿了，而是忙于自身的整顿。

④⑬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④⑭新华社，1957年6月11日讯；1957年6月12日《光明日报》。

④⑮195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④⑯1957年6月9日《大公报》。

④⑰1957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④⑱新华社，1957年6月18日讯。1958年1月以前，他一直担任粮食部部长。新华社，1958年1月31日讯。

④⑲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④⑳各种各样的新华社快讯。

④㉑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④㉒新华社，1957年6月18日讯。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龙云也主张中国少向其它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他说，土地改革已经导致农业的破产。许多好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理。再者，建设中存在着巨大浪费，而且失业严重。



龙云批评其同事对共产党的批评软弱无力。新华社1957年5月25日讯，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⑥3例如，楚玉先（译音，中国民主促进会）批评了机械地照搬苏联经验（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做法，麦克法夸尔：《百花》，第91页。

⑥4新华社，1957年6月21日讯。

⑥5新华社，1957年6月23日讯。

⑥6新华社，1957年7月6日讯。关于这一时期其他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发展情况，见新华社1957年6月30日和7月4日讯。

⑥7许道何（译音）：《互相监督》。

⑥81957年8月15日《光明日报》。

⑥9新华社，1957年8月15日讯。

⑦0新华社，1957年8月16日讯，亦见新华社1957年8月11日讯，关于地方组织的发展情况，见新华社1957年8月14、8月24日讯。

⑦1这一点于1984—1985年冬从我的一名采访对象那里得到了证实。该人认为调和派占多数；但情况又不总是如此。

⑦21957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这“42”名本属于人民范畴的人后来被打成“右派”。）

⑦3麦克法夸尔（《起源》第1卷第277页）指出，胡对其他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非常熟悉，并指出胡提供这个消息是为了使毛泽东难堪。

⑦4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⑦51957年9月12日《大公报》。

⑦⑥这就是说,只有占总人数的6%。这些数字(源自1957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使我们相信民盟成员的总数可能是36700人。参见上面的讨论,本书第4章,注③⑧。

⑦⑦数据由私人提供。在这6600人中有1000多人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类型的“反动分子”。

⑦⑧见《中国大陆新闻综述》第1621期中的各种新华社快讯。

⑦⑨1957年10月11日、21日《光明日报》。

⑧⑩李维汉:《民主党派问题》。

⑧⑪新华社,1957年11月29日讯。

⑧⑫新华社:1957年12月24日讯。

⑧⑬新华社,1958年1月19日讯。

⑧⑭新华社,1958年1月31日讯。

⑧⑮同上。

⑧⑯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有关中共的内部争论,见麦克法夸尔:《起源》第1卷第178页。

⑧⑰麦克法夸尔(《起源》第1卷第114、191页)比我更倾向于这种观点。1956年,刘说:“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

⑧⑱官方新闻机构报道说:罗“指出”毛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见麦克法夸尔:《起源》第1卷第273页。

⑧⑲关于把各民主党派作为毛的批判对象,见上书第270—278页。

⑧⑳李希方(译音):《武汉的“学术”活动贯穿着一条什么样的黑线》(中文),1966年5月6日《人民日报》。

## 第六章 民主党派の晦暗期

( 1958—1978 )

从“百花齐放”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对民主党派来说——同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相比，是一个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虽然民主党派成员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各民主党派也很少开展正常活动，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民主党派组织却没有消亡。

### 神 仙 会

头10年不必细说了。①在这10年里，民主党派只是按共产党的旨意行事。自1959年始，举行了一连串的“神仙会”。“神仙会”这个词或许具有讽刺意味，言下之意是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克服其优越感。共产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那些年面临很多困难，显然不想再搞什么残酷的运动了，所以没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处境还比较好。当局宣布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民主党派的会议则被冠之以“和风细雨”。的确有过一个短暂然而重要的缓解期，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民主党派成员想利用这一时机，他们当中就包括有名的吴晗。吴的民盟成员身份（时任民盟副主席）似乎同他在60年代初的政治活动并无多大关系。②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同大多数参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一样，是共产党员。③

在非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一位比较活跃的人士，即民建的

黄炎培。他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回忆录，向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提了不少建议。不过他也有压力。压力之大，以致不久他便发现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历史分析。回忆录实际上是由黄炎培口述、他人代写的——这在当时是唯一被允许采取的方式。在这部回忆录中，许多重要情况被略而不谈，或避重就轻加以割舍。“文革”期间，这部手稿（直到1982年才出版）被视为黄的“罪行”之一。<sup>④</sup>

尽管如此，到1963年，民主党派似乎在某些方面开始重新获得旧日的风采。相当一部分被打成“右派”的人摘掉了“右派”帽子。此外，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甚至左派分子康生，也接二连三地表明了对民主党派的支持。

## 文 化 革 命

然而，刘、邓、彭在几年之后遭到了清洗，民主党派的一切希望看来也随之而去。他们成了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对象，统战部门被视为执行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sup>⑤</sup>激进分子宣布民主党派为反动组织，其领导人为反革命分子和敌人的代理人。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在三天之内全部解散。于是，各党派机关在指定的期限内相继声明停止活动。<sup>⑥</sup>民盟北京市委门前还贴出了宣布该组织解散的告示。<sup>⑦</sup>（实际上并没解散，告示或许只是为了转移红卫兵的视线。）虽然民主党派领导人有时即使在国家庆典活动中也不按常规露面，但在别的场合他们却被拉去游街示众。他们大概是受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牵连。总之，他们由于先前对非激进派共产党人物的支持，这



时开始祸及自身。

北京市的形势发展具有代表性。人们记得，吴晗副市长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同彭真市长对毛泽东的批评扯在了一起。因此，像吴晗这样一个民盟领导人蒙受一场新的劫难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了。<sup>⑧</sup>吴晗在1943年就加入了民盟。50年代初，他对自己所持的“超阶级论点”<sup>⑨</sup>作了自我批评；自此以后，相安无事。他大概在1956年前后加入了共产党，尽管此事长期不为人知。在“百花齐放”前，他没有对毛的政策提出批评。其时，正象前一章所讲的那样，他紧跟彭真。接着，他干了一件现在看来是不顾后果的事情。1959年，他写了一部名叫《海瑞罢官》的剧本，大意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明朝官员依法办事，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自己因此被罢了官。这部剧本于1961年出版，接着被搬上舞台。观众对此反映良好。但在1965年，左派认为该剧包藏着反革命的阴谋。当时尚无名气的姚文元<sup>⑩</sup>（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首先公开发难，其他人也随之附和。人们记得，该剧本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写成的，当时许多人要求放慢大跃进的速度，要求推行非社会主义的私人土地制度和重新审理50年代的一些政治案件。因此描写海瑞的意义很清楚——海瑞在几个世纪前就重新分配了土地，并且执法如山。此外，吴的剧本强调了海瑞罢官，这一点不禁使人猜想，这位剧作家所关注的其实不过是左派的死对头——彭德怀元帅被革职一案。

当无产阶级变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不幸的吴晗自然成为第一号目标。起初，一些舆论，特别是北京的舆论界，还是支持他的；即使批评，也没有恶意。<sup>⑪</sup>但这一“论战”很快

演变成了反对吴晗及其所代表的人和事的全国性运动。1965年底，吴作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sup>②</sup>这个自我批评未能使他的批判者们满意。这时，舆论已经一边倒了，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心情都很复杂。他们所抨击的毕竟是他们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而且有人在想，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了。然而，确也有人想借此合法形式，攻击共产党（吴毕竟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人则试图趁机报复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背弃自由派的人，特别是民盟中的这类人。<sup>③</sup>1966年，虽然对吴晗的批判急剧升级，但这时他仍然有许多同情者。在此后的几年里，民主党派人士不仅成了批判对象，而且遭到严重迫害。

在这一时期受到清洗的还有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即民革成员王昆仑（后来成为民革中央主席）。1966年，红卫兵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同时失去了副市长的职位，他及家人蒙受冤屈约7年之久。

即使民主党派领导人中的进步分子也遭受到严重冲击。史良就是这种人士之一。她在1957年曾带头批判罗隆基等右派。（后来她完全恢复了名誉，并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当时，政治斗争和个人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据说，史是康生（现已还原其本来面目）和她的妻子曹轶欧点名批判的对象。

虽然民主党派的境遇可能更糟，但其组织至少还是保存下来了。原因无疑是它们受到了当时中国两位最有权威的领导人的保护。众所周知，周恩来甚至在“文革”最困窘的时期仍然保护了大量的民主人士。有一次，周总理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用飞机把一位民革的人士接到了北京。还有一次，周派他的私人秘书阻止了一场有可能使用暴力的批斗一

位年事已高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批判会”。<sup>⑭</sup>更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本人也出面挽救民主党派组织。1966年10月，当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时，毛主席发话说：民主党派还是要的。<sup>⑮</sup>结果，民主党派没有被正式取消。

尽管如此，灾难最终还是降临到许多人头上，因为已经没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能够真正控制局势。那些本应保护民主党派的人，即负责统战工作的人，也因解职而无能为力。（李维汉在1967年被加罪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1年之后才得平反。<sup>⑯</sup>）由此，民主党派成员所受的苦难实难言表。吴晗在监狱里被打得奄奄一息，送往医院后死在那里。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也在不间断的政治斗争中丧失了生命。民革创建人之一的梅龚彬就是一例。<sup>⑰</sup>“资本家”也是红卫兵的攻击目标，因而可以想见，民建有许多成员也死在他们手里。

然而，民主党派机构本身却很少受到冲击。确切地讲，受到冲击的只是那些党派成员（知识分子等）。（对吴晗的攻击用了各种恶毒的语言，不过他所属的民盟组织，据信，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实际上，民主党派身份并不总是有害的。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它反而起了好的作用。70年代初，各民主党派继续给其成员和家属带来好处。例如，一个下放到农村的青年如果有民主党派背景的话，就可以受到特殊照顾；如果他的双亲是地位很高的民主党派人士（而这种关系就是有“后台”的标志），他甚至可能会返回城里。<sup>⑱</sup>

一直到1976年毛去世前，民主党派的存在基本上还只是流于形式。虽有一些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偶而露面，

但自1966年起，已不再有关于民主党派开会的报道。少数民主党派成员仍在政府供职，有一位甚至到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任职。<sup>⑩</sup>但对大多数人来讲，首要的目的还是自保安全，期盼这场风暴早日结束。

### 注释：

①关于中国各民主党派在60年代（也包括70年代）的情况，在阿兰·波伍写的《作为群众组织的中国民主党派》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我在撰写这一章时参考了此文。

②吴晗在积极争取了许多年之后，于1957年3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③参见摩勒·戈德曼：《1961—1962年奇特的争鸣》。

④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

⑤波伍：《中国的民主党派》，引自《共产主义中国》，1965年卷，第40页。

⑥美联社新闻，1966年8月26日，引自《问题与研究》（1988年4月）第97页。

⑦《巴尔的摩太阳报》，1966年11月23日，彼特·昆帕的报道。

⑧本书关于吴晗的多数材料取自詹姆斯·西摩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版）第209—223页。如欲进一步了解吴晗，可参阅汤姆·费舍尔的《吴晗》，以及胡愈之和李文愈合写的《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⑨施少频（译音）：《评吴晗的矛头所指》，《红旗》杂志1966年第6期，第24页。所批论点引自《中国青年》1950年第2期。



⑩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⑪有人为《海瑞罢官》辩护，如李振宇（译音）于1965年12月9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

⑫吴晗：《对〈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⑬《历史学家如何对待当前形势？》见1966年1月7日《文汇报》，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⑭1985年7月12日出的《亚洲周刊》第27页。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的总体分析，参见大卫·庞纳维亚：《一位高官的新神话：重评周恩来的业绩》，《远东经济评论》1986年1月23日。

⑮在1966年10月24日“报告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译自《新闻资料》第891期（1969年10月8日）

⑯《纽约时报》1978年2月28日第5版。

⑰见新华社，1980年1月18日讯。

⑱这个论断只是根据一个已知的事例——一位省级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子女的事例——作出的。资料来源于理查德·麦德逊写的访谈录。

⑲这件事发生在浙江，见波伍：《中国的民主党派》。

## 第七章 民主党派的今天

毛泽东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着手恢复民主党派。①由毛带头作出此举是困难的。但是叶剑英发出了信号，他在1977年一次会见浙江政协代表时指出：“民主党派应当保留下来。”②重建这些组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许多民主党派成员被迫遣散到了国家最艰苦的地方，有时要派人去把他们找回来。许多人是勉强重新加入民主党派，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长期被看作“历史反革命”，而正是由于参加民主党派才招致这么大的不幸。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拨乱反正的任务，这项工作进行了好几年。③各民主党派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业已得到充实的中央委员会参与了对特殊案件的研究和审议。在当时，拨乱反正的经常性的做法是死后平反。甚至有这样的事例：由于某个人“遭处决、蹲监狱或被管制”，会使其子女受到牵连，因此“撤销判决”就决不是没有用的。有时候，即使在法院拒绝重新审理的情况下，主要由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的工作组却有权重提旧案和提出建议。当然，拨乱反正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案件即使在工作组提出合理的建议之后，还是悬置一边。④不过，毕竟还是有不少案子已经得到较好的处理。

在中国民主同盟看来，为已故的历史剧作家吴晗平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1985年，“海瑞罢官”在民盟的努力下重新上演，以纪念该剧诞生25周年。⑤

现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变得和以前一样宽松。（1956—1957年那段经历除外。）的确，回想起那些年，民主党派被强调为政治批评的论坛。舆论工具努力使群众寄希望于此，对共产党的批评不仅仅是受欢迎的，而且是刻意所求。凡经历过1957年的人都熟悉这样一个调子，即像《中国日报》<sup>⑥</sup>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明文规定：共产党保证将充分接受来自党外人士的批评，认真改正错误，严禁对提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这张报纸没有提及，近年来对中国民运分子的抓捕风潮，尽管当时正在进行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sup>⑦</sup>各民主党派被要求确信，整风的目的仅仅是针对共产党自身，而不是针对它们，并且要它们相信，对那些指控有违法行为的共产党员将得到彻底的处理。<sup>⑧</sup>

中共为改善民主党派的形象尽了种种努力。1979年冬至1980年期间，各个政治局委员分别在各民主党派的会议上讲了话。邓小平向他们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与劳动者相联系的政治联盟。<sup>⑨</sup>还特别向民主党派的那些学有专长的专家们提出希望，要求他们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献计献力。他甚至强调，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推进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方面同样可以作出贡献。<sup>⑩</sup>

在舆论宣传中，民主党派倍受赞扬，特别是它们当中那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成员。<sup>⑪</sup>在1985年召开的一次影响很大的全国性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祝贺各民主党派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成绩。他希望他们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继续为机构调整、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

经济服务。通过自己的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努力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通过加强同台、港、澳及其他国家的联系，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这是共产党官方对民主党派作出的良好评价。<sup>⑫</sup>

需要认识恢复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首先应是共产党员。虽然在共产党内为提高教育水平进行了努力，但其普通成员大部分仍然属于文化和知识水平有限的人。<sup>⑬</sup>这些人必然成为民主党派首先批评的对象。领导层似乎还未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如果知识分子真正解放了，那么共产党员就极易受到损害。不过，近几年来，领导层一直努力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尝试只获得有限成功）。《红旗》杂志上有篇文章就曾写道：“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爱国者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虽然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主义者那将是美好的，但是所有的爱国者也可以为祖国作出贡献。<sup>⑭</sup>该刊还有很多文章从总体上强调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并且在特殊意义上强调了民主党派成员的待遇和使用问题。<sup>⑮</sup>有文章指出，70%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中的优秀人物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并使他们有权有责。”<sup>⑯</sup>

1983年底，各民主党派举行了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它们虽然制定了各自的章程，但这些章程却大同小异，各民主党派的章程用了相似的措词表述每个党派的特点。中共高层领导在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总书记胡耀邦也发了言。最不同寻常的是，中共领导人把民主党派称作“战友”，并使用了类似“贵党”和“鄙党”这样的用



语。但是，并非所有的民主党派成员都有感于此。相反，有的成员指出，中共仍然存在某些来自“文革时代”的坏习气。<sup>⑮</sup>恰其时，正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然而多数民主党派领导人却是些耄耋老者。尽管1983年新人换届，但他们同样年龄太大而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著名的律师史良（生于本世纪初<sup>⑯</sup>）在担任民盟主席两年之后就去世了，<sup>⑰</sup>她的继任者——民盟代主席胡愈之，和她一样在任职不久后即于1986年逝世；此后，胡愈之又为87岁的楚图南所接替。<sup>⑱</sup>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老人，王曾在1957年报怨民主党派是“眉毛”，即无用的附属物。在“鸣放”结束阶段，他参与了对其同事，特别是对龙云和章伯钧的批判。这样，就使他避免了麻烦，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才和其它北京市政府领导人一起被下放。但像前述两位民盟领导人一样，王很快也去世了。<sup>\*\*⑲</sup>新任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的年龄不详，<sup>\*\*</sup>不过，在1983年，民进主席和几位副主席的平均年龄是82岁。<sup>⑳</sup>由此可见，恢复民主党派活力的工作仅只限于在一般成员中进行，而在上层则无动于衷。可以认为，未来民主党派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会使中共感到不安。

同在1983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北京恢复办学。这个学院主要培训民主党派干部和其他统战部门的干部，它建立于1956年，1966年至1983年11月停办。该学院学制为两年，学员所学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统一

<sup>\*</sup>王昆仑于198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译者注

<sup>\*\*</sup>周建人于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译者注

战线理论和政策、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和科学技术知识等。第一期毕业班有来自全国各省（大概除西藏外）的72名学员。<sup>②③</sup>这所学校可以起到不用强制办法而使民主党派与中共保持一致的作用。它不仅保证那些负责民主党派工作的干部（这些人与各地方支部的领导人打交道）适合党的要求，而且还可以提高民主党派干部的知识水平，以使他们不脱离民主党派成员。

## 民主党派的组织情况

1984和1985年冬季，我在中国走访了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想从与这些普通成员的交谈中了解他们参加民主党派的情况。虽然我的采访对象中有几位老成员，但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新成员，这些党派的未来就寄托在他们身上。这样，我的采访对象也就相对年轻一些，尽管他们至少已都是中年。1980年以来参加民主党派的略占多数；其余则是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加入的，也就是说，是在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前后几年加入的。除民主党派的“年轻人”之外，我的采访的目标大概就是民主党派的典型人物。他们当中既有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家，又有1957年——1958年那场反对自己知识子同仁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所采访的都是汉族，<sup>②④</sup>都是男性成员，这反映了在民主党派中只有少量的女性。<sup>②⑤</sup>

我采访了四个（不是六个或八个）<sup>②⑥</sup>党派的成员；而这些人中间多数又是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成员。

除民革外，<sup>②⑦</sup>各民主党派都有特定的专业分工。有时，

象民主建国会，却很难确定它与另一明确的专业团体（即工商业联合会）之间的界限，其职能、会员资格和领导机构都是重合的。<sup>②8</sup>

多数民主党派要求其成员，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这就是它们缺乏20到40岁成员的原因。虽然这个吸收新成员的标准是完全公开的，但要使每一个支部都坚持这个标准，却还需要再作努力。一般来讲，各民主党派都执行了这个标准，不过有的民主党派在执行这个标准时要比另外一些党派严格些。最严格的党派之一是九三学社，其成员必须是副教授或有相当职称的人（但不一定限于大学范围内）。他们多数从事科技工作，尽管我的采访对象中唯一的一名九三成员是搞文学的。

民盟在吸收新成员方面看来不那么严格。一位被访问者说，他所在支部的所有成员都是教授或研究员，但是另一位被访问者却说，他们支部的标准比较低，这样做是为了吸收较年轻的成员。（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荒疏，知识分子趋向两极——不是年老就是年轻。）不管怎样，民主党派的入党标准由民主党派决定，而不是由中共决定，这一点是明确的。

在各民主党派中间，入党的程序是相同的，而且与加入中共的程序相似，（只是不如中共那么严格罢了）。首先，一个人要有两名党员介绍，然后由支部和更高一级组织批准。给人的印象是，现在中共通常不干预这个过程。这些组织，无论如何不会吸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或制造麻烦的人。吸收党员必须坚持一定的标准，一个新党员的政治思想一定要合乎“标准”。有时有的人被拒之党外，就是因其顽固的

政治态度或其他态度所致。一个人必须拥护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然而拒绝入党的更普遍的理由，是认为其学术水平不够。还有少数人不能入党是因为他们年老体衰。有三个社会阶层——工人、农民和士兵仍在发展范围之外。

现在，民主党派很少有人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事即使发生（尤其在民建），也是出于腐化的原因，我最近没有听说由于政治原因被开除的。而这类事在以前是司空见惯的。例如：一位在40年代就积极参加民盟活动的上层民主人士，大约在1950年被中共逐出民盟。他说当时所有其他自由分子也都被开除出盟。一位拒不接受改造的著名学者在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之后又坐了两年牢。1984年，当他被邀请重新加入民盟时，他拒绝了。他仍然认为，该组织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而且他也清楚，入了民盟也不会让他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

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使人们加入民主党派的动机问题。这些动机五花八门。下面是几种类型的现身说法：

“我想结识乐于思考的人。我想有效地从事政治活动，并想借此了解如何使之成为可能。但我不想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

“我不信服共产党，我会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感到羞耻，因为那将意味着自己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通过加入某个民主党派，而不加入中共，我也能参与公共事务。”

“我想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作为一个被认可的组织的成员，可以提出受政治保护的议案。”

“1957年，我才十几岁，当时任团支部副书记，因对一些学生不上课提出批评，并主张一定的改革，结果我被宣布



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直到1979年才摘掉。我认为我的问题直到1984年才得到彻底澄清，正是在那年，我被批准加入了这个民主党派。”

“多年来，我一直与民革保持着联系。最终促使我加入民革的原因，是各地方支部参加冯玉祥（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纪念活动的计划；更一般的理由则是参加民革有助于保留国民党的好名声（这一点是说明，虽然国民党曾经被反动派所控制，但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员都是坏的）。”

“我恨‘文化大革命’，参加民主党派是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方式。我坚信温和手段，尤其在政治策略方面；甚至当学生的目标可能正确的时候，我都反对学生游行示威。”

还有更多的人接受了采访，他们无疑还会说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就像人们加入民主党派有出于热心公益的理由一样，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个人考虑，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一个人一旦加入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能否不使他失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能否得到同那些先加入民主党派的人一样的好处？总的来说，我从我的采访对象那里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也有人受到了我的提问的方式的影响。这些采访都是通过个人关系安排的。我的所有中国熟人都是些有才干的、自信的、自主性强的人，而且他们的朋友也都属于这类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与把我介绍给不适当的人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上述参加民主党派的好处在此仍值得再书一笔。例如：有人说：“现在转达意见或提出建议是可能的了。”另一个人说：“我敬重我们党派中那些资历较深的人，现在我能够经常见到他们并从他们

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还有人谈到：“我们将进行参观视察，象这样的事，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才行。”（这些参观游览是民主党派成员一个较大的利益，因为没多少中国人能有这样的机会。1985年，政府虽然制定了一个严格限制到风景区学习参观的规定，但是，民主党派却似乎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sup>②</sup>

受访者还不得已回答了民主党派成员是否有更多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一些人否认有任何额外的好处，而较有代表性的回答则是：“虽然它不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对子女分配可能有利。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到我们都变成老人时才会受到重视，那时，我们民主党派的领导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提拔或享有其他利益例如改善住房条件，他们才可能为我们说好话。特别对担任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职务的人是如此。当然，如果我决定改变我的工作单位（这在中国正常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我的民主党派中的所有熟人就会大大帮忙。”

民盟的一位领导人认为，组织是关心自己成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住房问题）的。“这些小问题是重要的。政府太大了，它看不到这些小问题。”他最近就帮助一对夫妻调动工作，解决了他们的两地分居问题。（当问到民盟成员这类问题得到特殊的合理解决的情况时，他说民盟也帮助那些不是民主党派成员的人。）满足知识分子要求的工作，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之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这些受访者通常还在等待，尽管他们经常希望他们的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得到更好的住房。

地方政府被要求给这些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或者说

是支持），因为党员和干部已对民主党派有了一定的尊重，他们把民主党派成员看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同仁”。这里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来看待民主党派人士，认为他们是二流的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虽然从现实考虑，这样看待是不公正的，但是从各民主党派的背景看，上述认识却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位香港记者告诉民革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海外很少有人听说过民革时，他说他不感到惊奇，因为“国内许多人也不知道（我们）。”<sup>⑩</sup>

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信息都是一种力量。在中国，由于其信息系统非常闭塞，因此对个人来说，了解政策的发展以及正在刮什么政治风是极其重要的。这些采访揭示了民主党派的渠道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是非常有用的。简单说来，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例，即在某些政策公布前就有人知道了它们的内容。这样的信息可以包括从工资问题到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对外方针政策等等。有时在民主党派的文件或讨论中搜集到的信息可以很快通过某个人的内线传出来。例如，有个人说，他通过民主党派的渠道了解到作家可以在海外发表文章，并由此取得版税，便根据这一信息迅速采取行动，走在了同伙前面。另一个人（此人碰巧也是一名中共党员）断言，他经常通过民盟获得信息，这比通过党内渠道获得信息要快。<sup>⑪</sup>

我向民主党派成员询问了他们在政策方面有何影响，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回答：

“我觉得，作为一名民盟成员，我能够真正参与我们学校的管理工作。”

“我是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并

且可以就有关事项提出建议。”（在此他没有提供已经这样做过过的具体事例。）

“如果有事需要商量的话，我现在可以直接去找中共。他们比较喜欢听民主党派的意见。”

“我们正设法为地方民盟组织寻找办公的地方，因为老地方现在被人占了。我们也为改善我们民主党派人士的居住条件、解决盟员的两地分居和归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的财物而奔波。”

“我们呼吁那些有污染的工厂由市区迁到郊区。我们敦促那些错误地否认文凭的地方予以承认文凭。”

（一位民盟领导人说：）“我们经常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协商以下问题：（1）五年计划草案。（2）重要经济建设项目。宝山钢铁工程在停建两年前，民主党派人士就对它提出了批评，当该工程重新开启时。他们的建议得到采纳。政府在处理渤海事件时也大量听取了各民主党派的意见。（3）文字改革。民主党派人士不仅在50年代，而且在“文革”前的60年代就投入了这项工作。书写方式由竖排改为横排的动议来自民主党派人士，他们认识到，改革对于推进科学和多种文字的书写是多么重要。（4）增加教育经费，尤其是小学教育。（5）中年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的问题。”

这位民盟领导人最后讲的这些意见或许带有一点怀疑主义的味道。有人一定会问，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听到那么多他们并不想听到的东西。<sup>②</sup>广大民主党派成员虽然比其他人提出的意见易于被人接受。但仍然仅限于当政治工具来使用。领导层完全与支部会议相隔绝，而支部会议正是最普遍



发表意见的场所。并且它控制着其它活动场所——各基层人民政协——的成员。<sup>③③</sup>此外，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有许多专题工作组。<sup>③④</sup>偶然透露出消息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政协（包括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委员们始终有权以个人名义或小组名义在定期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提案。并且有关部门要对此作出答复。至少也要对反映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得到满意解决作出解释。这些人很少相聚，而且很少有这样真正的机会。现在，一个新的专门处理两次全国政协会议之间所提提案的委员会已经成立。<sup>③⑤</sup>一些省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政协座谈会，要求共产党员在会上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仅仅口头上的服务是无用的，形式主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实际行动才是必须的。”<sup>③⑥</sup>

偶尔，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批评也能直接了当地提出。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不是来自于我的采访对象。而是来自于传播媒介。例如，在广西1984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知识分子居住条件不好的原因是好多单位变成了官僚机构；本地区教育水平低是因为许多教师不合格；至于大学，“它们既没有人事权，也没有财权，”应当给它们一些自主权。提出的问题还有：政治标准问题、专业队伍问题、食品供应、以及工资问题等。<sup>③⑦</sup>同样，福建民主党派人士批评有多少共产党员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中拖了后腿，指出“象这样的干部必须受到批评、撤换或开除。”<sup>③⑧</sup>

1984—1985年冬，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例是民主党派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这项政策是关于巨大的三峡工程（为修建一个横跨长江的大坝）的问题。这个使完全建立一个新省

成为必要的计划，由于可能会影响生态而使海外瞩目。在中国，持反对意见的人虽然缄默不语，但不是没有反对意见。<sup>③</sup>原计划的主要反对者是民主党派成员，即九三学社的著名工程师。这个党派成功地使该项目搁置起来至少达两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可行性研究。当局一直在修改方案，以期使批评者满意。政府不想越过民主党派的反对意见而坚持实施一个冒险的计划，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就会造成尴尬。“百花齐放”时期共产党落得尴尬局面就是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民主党派批评共产党的错误是对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有权对某些问题保持自己独立的看法，而且他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不是与他们的专业有关，就是与他们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身份有关。在中国，一个人要公开表露不同政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民主党派规定允许退党。当问及采访对象他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是否有感到厌倦而退党的，这些人都声称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在问到如果一个人不积极参加活动该怎么办时，上海市民革的办公室人员说，这些人仍将保留注册。不过，他们又声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我只听说有一个人因为“讨厌开会”而不是因为不满退出了民主党派。使人变得消极或导致退党的最普遍的原因是他们调到没有支部的地区去工作，<sup>④</sup>以及参军或加入中共。

一个人同时兼具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两种身份的问题是一个需谨慎对待的问题。过去，一些担任民主党派中央和省级领导职务的人同时就是共产党员。<sup>⑤</sup>（事实上，共产党员或实际上的共产党员在40年代后期就有意渗入到民主党派之中。）但是，自1978年以来，有政策规定民主党派干部不再归共产

党管。

一般来讲，现在共产党员不能加入民主党派，可是民主党派成员有时却可以参加中共。例如，据传上海有8或10个民革成员也属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可以要求加入中共，是为了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人虽然继续留在民主党派，但显然已不再那么积极了。因为牵涉到他们代表谁的问题，<sup>④</sup>所以，对这种人继续出席民主党派会议是很难处理的。

在1949年以前，一个人同属于两个民主党派是不稀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民盟当时是一个政治保护性组织。但是，1949年以后，人们通常只允许加入一个党派。这样，我采访的人当中就有一位不得不在民盟和民建之间作出选择，而他选择了后者。

民主党派的组织建制颇与中共相似——有设在北京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有中间层（省或市级）的组织，以及设置在工作所在地的地方支部。到1983年底，民盟拥有2300个支部。<sup>⑤</sup>这些支部的规模控制在14至30人。通常一个单位只有一个支部，但是有所大学却有4个民盟的支部；每个支部由从事同一专业（自然科学、中国历史、外国文学和地理学）的人组成。这所大学还有一个别的民主党派的支部，以及另外两个没有在此建立支部的民主党派的几名成员。

支部负责人以前是由上级组织选定。现在每4或5年进行一次选举，而且支部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在能够自行决定的情况下，共产党不派员观察选举。虽然要征得民主党派上级组织的同意，但多数接受采访的人却认为这是例行公事。支部通常有一名专职领导，但有时有一个类似指导委员会的机



构。作为选举的第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一个支部的选票上通常有3个人的名字（允许投非原定候选人的票），其中一人当选。第二典型事例是：一个民盟成员讲道，候选人（即9名）一般多于应选者（7名）的人数；任职者一般可连选连任。当选者总要获得50%的选票——只要获得多数，当选就没问题了。这些领导人中多数是称职的，而有的人则仅仅因为出名而被当选或落选。接受采访的人抱怨说，这样的人没有时间搞好支部工作。

民主党派〔支部〕会议差不多每月举行一次，偶尔也召开总支会议。在50年代，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少，<sup>④</sup>而按照规定，除了生病或时间冲突外，每个人都应参加支部会议。一个人说，如果事先请假不参加会是可以的。会议常常有一个预先确定好的论题。对于参加讨论是否属于走形式的问题，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一些人说，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但另一些人说，不发表意见可能被看作是对报告内容或正在做的事情不赞成。<sup>⑤</sup>因此，并非所有与民主党派相关的旧有压力全都消失了，而只是强迫喊口号的作法似乎已成为过去。

再谈一谈支部与其上级机关的关系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虽然有的支部既向民主党派上级机关又向地方中共统战部作汇报，但是我采访的多数人坚持认为，他们支部只在民主党派范围内汇报。<sup>⑥</sup>“统战部在有关国家政策方面进行指导，但没有管理我们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的职责。”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却必须由共产党决定，如各个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数问题。<sup>⑦</sup>

正如共产党干部的工资由国家支付那样，民主党派干部的工资也由国家支付。<sup>⑧</sup>他们的工资是其省级机关的主要开



支。如果预算过多地超出工资需求，这样的预算案就容易被否定。地方支部似乎得不到上级民主党派机关的任何资金，因而必须自力更生。党员交党费，一般为一元（每月工资的百分之一），但交费数额还要依支部需要和党员支付能力而定。据了解，交纳党费最少的是每月0.10元（民革某支部一个成员每月收入不足100元）；最多的是3元（一些支部月收入超过100元的成员）。民建是民主党派中经费状况最好的，因为它的成员收入最高。其他民主党派支部不是没有资金开展工作（日常活动不需要多少经费），就是结合“为四化做贡献”搞一些募捐活动。<sup>④</sup>

## 民主党派的作用

共产党扶持这些民主党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所有采访对象我都询问了他们支部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这些成果的，其回答一般也不外这两个方面。首先，教育得到了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倡导民间办学而促进的。特别对民盟和九三学社的支部来说，这样做是可行的。一个城市可能有几所这样的学校，它们经常利用公立学校的课后的设施开展业余教育。在呼和浩特就至少有一所民主党派的学院，即一所由民盟管理的专修外语和技术专业的学校。<sup>⑤</sup>这里的授课教师也是流动的，他们甚至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讲学。虽然这些教师往往是退休人员（不一定是民主党派成员），但是在创建这些学校背后最起作用的力量却是那些新近加入民主党派的较年轻的人。有的学校提供成人教育，有的学校组织高考复习，有时候，学生还是些孩子；课

程设置从技术专题到外语讲座都有，学费适中，教师报酬每月只有8至20元。不过，开展这项工作却常给民主党派支部带来不少收益。全国现有500所民主党派兴办的学校，在校生和毕业生达50万。<sup>⑤</sup>根据多数报道，这些学校功能齐全，并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但是，有的也遇到政治的和官僚主义的难题。广西的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抱怨说：“在办学方面，民主党派遇到了各种限制。我希望中共自治区党委认真对待教育问题，广开门路，切实开发广西的智力。”<sup>⑥</sup>

根据官方的观点，民主党派参与教育的优势是不用支出公共资金便可提供学校教育。虽然有时地方政府提供教室或建校场地，但一般也要由民主党派成员提供实际使用的资金。这个程序通常是由民主党派成员提供基本资金；然后，学费充作学校活动的自有资金。（普通班每学期学费是6元，大学课程每学期是20元。）<sup>⑦</sup>

更能为民主党派成员和组织创收的是向企业开展咨询工作。除小企业外，中国不是一个适于个人大展才华的地方。可是，有了象民主党派那样的组织赋予的合法性和提供的联系，一个人就能干得出色。自从人们认识到各民主党派是“人才库”以来，经理们便经常向他们寻求帮助。有时这些咨询者也动手去做，例如到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修建自来水库。<sup>⑧</sup>咨询范围包括教育、医疗、经济、管理、财会、统计、市政工作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等，截至1985年，少数民族地区约有1000个企业在民主党派的帮助下建立起来。

咨询往往有金钱方面的吸引力。典型的例子是，工厂为咨询一个项目要付2000元，其中个人得30%，剩下的归民主党派。到1985年中，民革完成了68个包括经济、法律、医

学、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项目，<sup>⑤</sup>民盟和民建无疑更多。

民主党派促进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其成员可以就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作巡回演讲。同时，这类活动在没有这种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况且其他专业团体也开展了类似的服务活动。但各民主党派似乎在很多方面作出了真正贡献。

虽然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希望这些党派成为国际上通常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政党，但目前这些“政党”为在政府任职提出候选人的职能还不明显。一些地方民主党派组织有人参加了各种地方机构（通常是政协，有时也有人参加了政府或地方人大）。事实上，一般的做法是留出一定数额的职位，由这些“民主人士”来填充。6%的民主党派成员是全国或省一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sup>⑥</sup>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这些候选人不是由共产党选定的，而且也没有人对这种状况发出怨言。

当问到他们是否对自己的党派有任何不满，或是否有该做却未做的事情时，回答多偏于保守，尽管有一个人强调说没什么新任务可承担。（“我们已经做的够多了，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只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党派作出坦率的批评——这是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抱怨说，与较大的党派民盟和民建不同，他所在的党派缺少基层组织，而且没有足够的做民主党派工作的专职干部。更尖锐的是，他还用这样的语言批评其同伴：没有充分独立的思想家；人们因拖怕了而谨小慎微；他们忘不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们“太顺从了”。

然而，民主党派不是没有生气和可有可无的组织，它们已为国内外所广泛认知。它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发展，一些支部已变得很大，新的支部又在不断建立。许多新的省级机构在建立；全国范围的基层组织在加强。民盟还在北京修建新的中央办公大楼（固然与现代办公设施相比没什么吸引力，但它却是座落在以前一位皇族成员的住宅旧址）。

新成员会使民主党派恢复活力并使其成员的平均年龄降低，尽管新吸收的成员一般都超过45岁。就民建而言，我听说，如果吸收的成员太年轻，他们对组织就没什么价值。他们必须经过考察才能搞咨询服务。他们也经常被要求提供无偿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是离退休人员或是领取养老金的人。这样，组织发展的重点自然就是年龄较大的人。<sup>⑤7</sup>但其他民主党派在降低成员的平均年龄方面获得了进展。尽管九三学社对入社资格有特殊要求，但在1983年，它的成员有34%是在56岁以下。这个比例在其他党派是达不到的，不过从民盟的情况看，有四分之三的新成员在55岁以下。<sup>⑤8</sup>

一些看上去基本上属于“受人支配”的成员之所以参加民主党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同事这样做了，另一些可称做“有独立看法”的人（即带有自己的打算的人），则把民主党派当作完成他们所要做的事情的手段。然而正是那些受人支配的人，在人们看来，他们属于有道德心、认识到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责、并努力工作的人。（共产党显然同意这种评价，它授给了30%民主党派成员以“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号。<sup>⑤9</sup>）

各民主党派对影响公众舆论的意图已经淡漠。事实上，



从1957年——那时，《光明日报》和民主党派的其他报纸都被别人接管——以后，它们已没有实现这一企图的任何工具。<sup>⑥0</sup>然而，在1985年春，民盟开始出版一个新的月刊。刊名为《群言》，它的字面含义为“群众的声音”，但是翻译成英语一般为“Opinion”（意见）或“Tribune”（讲坛）。第一期（发行6万份），内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自由的政治家李洪林写道：中国的权力结构应该改变，以使“每个人都有发言权”。<sup>⑥1</sup>有的文章论述了更为特殊的问题，如教育质量下降和教师问题。（众所周知的是，一个收废品的比一个正教授挣的钱多。）还有一篇出自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刘宾雁之手的关于文学和艺术创作自由的文章。《群言》虽然能够成为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该杂志的重要性却未能得到任何肯定。总之，出版物至少要在名义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及其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sup>⑥2</sup>

#### 注释：

①参见《亚洲概览》，1986年9月号。

②波伍：《中国的民主党派》，第17页。

③有一份四川省1985年的综合材料，见马丁（译音）：《我省落实了统战政策》。

④关于周一湘（译音）案件，参进程鹏的《不公正》一文。（周在1952年失踪前是一位积极的民革地下党员，1955年才公布了他被处决的消息）。另一类似案件是对民革创始人之一梅龚彬的处理，见新华社1980年1月18日讯。

⑤中新社1985年3月5日讯。

⑥1983年12月10日第3版。这里有两段论述是有趣的：

“过去，运动总是先从党内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每一个人。”

“当我爬上火车刚来到这个城市（北京）时，我儿子就一再告诫我不要多说话。他说：‘不要忘记爷爷的教训’。我的父亲就是在1957年言论开放而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⑦只有少量关于民主党派卷入反精神污染运动的事例，见兰州广播电台1983年11月4日讯。但是一般说来，这场运动对民主党派没什么影响。例如，据广东广播电台1983年11月9日报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向非党人士保证说：“要区分不同学派间的学术争鸣，尽管不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就是精神污染。”

⑧新华社1983年11月26日讯，一个相同的地方上的事例，见济南广播电台1984年1月18日讯。

⑨波伍：《中国的民主党派》。

⑩虽然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属于本书所述范围，但近年来台湾关系却是这些党派关注的重要领域。涉及对台关系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相联系）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要为台籍人士）。关于后者，可参阅布鲁斯·雅克布新近出版的著作。该组织领导成员的名单，见新华社1983年12月6日讯。民革的情况，见新华社1983年12月21日讯。

⑪对于工作成绩突出的进行了表彰。自1979年以来5年间，共表彰逾20000人，在1984年的受表彰者中有六分之一是民主党派成员。《中国建设》，1984年4月号，第30页。

⑫例如，一个省级传播媒体作了类似评论，见沈阳广播电台1985年10月24日讯。这些年常见的对民主党派的宣传还有另一种形式，即发布日益增多的有关计闻和事迹报道，如关

于民进中央委员吴文藻（新华社1985年10月1日讯），最近叛离台湾的国民党员马璧（新华社1985年10月15日讯），以及民革人士张治中的同代人等（新华社1985年10月27日讯）。

⑬见肖冲（译音）：《何时去掉“农民党”的特征——中共干部“知识化”问题考察》，《争鸣》，1985年第11期。

⑭于刚、余鑑则：《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

⑮一篇更注意从理论和历史方面加以论述的文章是陈紫云写的《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亦见《与党外人士合作》，198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

⑯刘小萍、徐爽：《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⑰1983年12月10日《中国日报》（第3版）。

⑱关于她的生年有不同说法，大体在1900——1907年间。

⑲新华社1985年9月6日讯。在民主党派中，妇女代表总是很少的。史是一位坦诚的女权主义者。1957年她就曾抱怨说：直到今天，各方面的人既看不起妇女，也不尊重妇女。甚至在一些共产党员的脑子里，还严重存在着这种封建思想的残余。有的部门不屑于使用女同志；有的部门则选择女同志当作多余的第一牺牲品来对待。（麦克法夸尔：《百花》）

⑳新华社1986年1月31日讯。

㉑新华社1985年9月27日讯。

㉒新华社1985年11月22日讯。周是中国20世纪最受尊重的作家鲁迅的弟弟。胡厥文再次当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新华社1983年11月21日讯。季方被选为中国农

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许德珩继续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建设》，1984年4月号，第31页。

②③新华社1984年7月2日讯。第一期教学实际只进行了10个月。

②④因为民主党派主要在城市里发展组织，所以它们当中很少有少数民族的成员是不奇怪的。

②⑤民主党派领导人中有几位杰出的女性，包括宋庆龄（民革）、史良（见上面注释①⑨）、何香凝（廖仲恺的遗孀、廖承志的母亲）和谢雪红。何是60年代民革的领导人；谢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创立者。但在民主党派普通成员中妇女很少。只有小党派九三学社妇女比例大——约为30%。虽然有人告诉我民盟的妇女占20%，但我接触到的几个支部都是在0——15%之间。民建有一个负责妇女工作的专门委员会，不过它主要联系工商界人士的妻眷。民进的妇女可能较多，但我在采访中并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党派的情况。

②⑥我没有对民进（主要成分是学校教师）和农工民主党（医务工作者等）这两个党派作详细的、直接的考察。还有两个团体通常也被划入民主党派，它们是致公党（主要对华侨）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本书没有把这二者当作民主党派来考察。

②⑦事实上，所有民革成员不是原国民党党员，就是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他们不一定是高级知识分子。民革如果只限于吸收原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话，它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民革为了延续下去而努力把国民党人士的后裔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起我注意的是，最年轻的民主党派成员是马宏诚（译音。1949年前他一直是西北地区的一位回族军事



和政治领导者)的22岁的孙女。组织部负责人邵恒秋对完全依靠国民党后裔来充实民革队伍表示不热心。他说：“有人认为我们应当物色那些其父母或祖父母辈参加过国民党的年轻人，但这样做却包含着可怕的封建色彩。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使其恢复活力。”《亚洲周刊》，1985年7月12日，第27页。关于民革的更详细的材料，见《问题与研究》，1984年4月号，第92—98页。

⑳一份台湾资料认为，工商联“实际上是民建的一部分。”《中国大陆》，1984年第4期，第13页。

㉑杭州广播电台，1985年3月21日讯。

㉒邵恒秋，引自《亚洲周刊》，1985年7月12日，第26页。

㉓1984年3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报纸——《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日报》阐述了向民主党派成员传达内部消息的规定。

㉔正是这种“受欢迎的压力”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着作用。《北京周报》上有一篇文章举例说明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创议：改革传统中医，恢复古典烹饪技术，解决茶叶和出版业方面的问题，以及提高教师素质。见李荣霞（译音）：《民主党派为中国现代化而工作》，第21页。

㉕1985年有2645名全国政协委员，各级政协委员总数为28万，1985年1月1日《中国日报》。

㉖如：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农业、宗教、民族、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

㉗1985年4月10日《中国日报》（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章）。关于政协的政治参

与，见新华社1985年4月9日讯，新华社1985年4月2日讯，1985年1月21日《中国日报》：《政协提案发挥作用》和1986年1月26日《解放日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③⑥引自中共湖北省委一位副书记的讲话，武汉广播电台，1985年3月21日讯。亦见长沙广播电台，1985年1月25日讯。信件也可以寄给官员，这样也可能会得到答复。在一定情况下，报纸上还会公开发表省委书记对来信的支持性的答复，如郭峰致周平伟（译音）的信，1984年4月14日《辽宁日报》，

③⑦南宁广播电台，1984年6月23日讯。其他民主党派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意见，见新华社1984年10月21日讯，新华社1985年3月27日讯和新华社1985年5月5日讯。

③⑧1984年1月20日《福建日报》。

③⑨见肯尼思·利波撒尔·米歇尔·奥肯伯格：《对三峡工程的期待》，《中国商业评论》，1986年第9—10期合刊，第7—9页。

④⑩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被正式认可的一个民主党派）中，成员可以不参加支部而直属其中央组织。但多数民主党派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见台盟章程第一章第二条，新华社1983年12月9日。

④⑪普通党员也是如此。在1956—1957年，民盟的一位领导人就告诉记者里查德·休斯：“我们民盟的一些成员加入了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民盟。我们一块共事，这你是知道的。”《远东经济评论》，1978年1月20日，第25页。

④⑫一份中国国民党的资料好像引用了1985年3月19日的

《人民政协报》，该资料说，这么多的民主党派成员加入中共，他们就应当和中共一样行动；但实际上，他们加入中共以后，还在继续参加民主党派活动。见《中国大陆》（台北），1985年第11期，第15页。国民党的其他资料还认为，多达50%的民主党派成员本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某一官方消息认为不少于2%），但实际人数不可能超过5%。见冯·斯·莱克：《敌人和朋友》，第218页。

④③新华社，1983年12月13日讯。

④④在1957年，一位九三学社的成员说只有大约60%的人出席会议。麦克法夸尔：《百花》，第99页。

④⑤见马丁·金·怀特：《中国的小团体和政治仪式》。

④⑥支部是直接向省级组织报告工作还是向某一中间机构报告工作，通常不是取决于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而是取决于支部隶属于哪一级单位。例如，如果某一支部是在由省政府管理的大学里，那它就应当向省级民主党派组织汇报工作。

④⑦民建和民盟和民革各50人，其他党派人数少于此。虽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大会决定参加政协的人选，但我不能断定这些代表大会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

④⑧但是在其他方面，民主党派干部似乎对中共当局的关系比对政府部门的关系更密切。民主党派干部的档案材料就是由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所掌管（至少管到他退休）。

《中国法律和政治》，1984年秋季版，第127页。

④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民主党派的经费来源情况，见冯·斯莱克：《敌人和朋友》，第217页。

⑤⑩新华社，1983年12月21日讯。

⑤⑪新华社，1984年9月1日讯。

⑤②南京广播电台，1984年6月23日讯。

⑤③新华社，1983年11月5日讯。关于民主党派民办学校的其他情况，见新华社，1985年12月5日讯，以及王学晓（译音）：《浙江》。

⑤④1981—1986年间，有数千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受聘参加了3300项边疆发展工程。

⑤⑤刘景怀（译音）：《民主党派》，第24页。

⑤⑥新华社，1983年10月29日讯。1982—1984年间，有7000名民主党派成员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北京评论》，1984年1月16日，第9页。

⑤⑦典型的做法是邀请合适的对象去听报告，希望在他们当中发现一些愿意参加民主党派的人。

⑤⑧新华社，1983年11月4日讯。

⑤⑨李荣夏（译音）：《民主党派》第19页。

⑥⑩关于这些出版物，见本书第5章，注④④。现在《光明日报》直接由共产党掌管，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

⑥⑪李洪林：《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群言》，1985年4月22日。李是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关于《群言》杂志，见新华社1985年4月20日讯和《远东经济评论》，1985年6月20日。

⑥⑫见新华社1985年4月20日讯和《远东经济评论》，1985年6月20日。



## 第八章 结 束 语

关于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约翰·伊希尔曾这样评论过：“在中国，如果你不是某种代表官方的知识分子，那你就根本不是合法的知识分子。”<sup>①</sup>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党派便是代表官方的知识分子的对应机构。因为共产党需要它们，所以它们同样得到共产党的认可与保护。虽然双方有关系紧张的时候，而且有两次达到完全破裂的程度，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民主党派这些代表官方知识分子的机构，始终对共产党持合作的态度。因为它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可能就会失去一切。

这些党派通过其他方式反映中国的基本政治状况。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广泛存在所谓的“小组”，<sup>②</sup>这些小组存在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巩固政权、培养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忠诚，以及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尽管民主党派可以被看作若干小组的集合体，但与上述小组相比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们虽说不是真正的精华，却也是由精英分子所组成，而不是群众性组织。它们也是自愿结合的组织，不要求严格的纪律性。50年代以来，民主党派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按照共产党的观点，其主要目的是把民主党派成员从骑墙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真正信仰者。但“百花齐放”表明这一点并没有成功，在整个民主党派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现在，这已不是什么问题了。尽管按中国的标准有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可能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有意无

意地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发表些议论)，但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几个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了。1957年的经历确实使人学到一些东西。从那以后，民主党派不再是点火棒，而是成了使共产党得以控制混乱局势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具有这种作用。

在某些方面，“百花齐放”与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邓小平在70年代末对政权提出的要求相类似。从三个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些领导人对党内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在“百花齐放”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虽然照毛的指令行事，但却又做得太过了，不仅使党内干部而且也使毛本人感到难堪，于是毛让党内干部予以回击。10年后，许多干部无疑感到内疚，因为这时在与激进派之间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本可以利用倾向一致的同盟军。直到70年代末邓小平恢复了民主党派以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这时已清除了自由主义者）间的合作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由于更为有限的原因，邓也给那些和“民主墙”有关联的真正的民主人士以短暂的自由。<sup>③</sup>旨在利用这些人的活动仅仅在有利于邓控制左派势力的范围内才是容许的。一旦目的达到，邓就像1957年对待自由主义人士那样对待这些民主人士——把他们投入监狱。民主党派得以恢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之所以不能被容忍，这是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而民主党派则不同，它们只对邓限定的、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设想感兴趣。

民主党派只不过是名称而已。（关于这个概念，我问过大多数我采访过的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使我确信这些党派是民主的。多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称谓才沿用至

今。其中有一人直率地说：民主党派“并不民主”。民主党派成员在其内部事务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如果有的话，也只限于支部一级。这些党派多少参与了中国政治的进程。至少当官方认可的组织中有人发泄不满时，它们能够起到某种牵制或“形式”上的作用；而当领导者想利用它们大造舆论时，它们又可以降低批评的调子或用模糊的颂辞加以指责。它们知道激烈的反抗会导致1957年历史的重演，而共产党也清楚这样的悲剧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民主党派的排他性使集权体制更为可行，所以它们的存在使中国更少有民主。<sup>④</sup> 简言之，这些党派标志着特权在上层而不是在基层扩大。

这些民主党派并不是政党，而只是一些发育不全的机体。而且“民主党派”这一概念不切合现在的实际，就像“State”（国家）一词实际上是指美国的州一样。然而，正如美国各州即使命名有误（即用“State”表示“州”——译者注），并不影响其真实存在那样，中国的民主党派也不仅仅是“花瓶”——就像常有人所贬低的那样。当然，装点门面确是其功能之一。<sup>⑤</sup> 还没有谁声称共产党真正与非共产主义政党分享政权。中国自称是一党制。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或至少是成功的政党，都是一定的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没有独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民主党派不再追求政治权力，它们是一支忠诚的、非反对派的力量。

由于民主党派只能在有限的人员中发展成员，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强大或有力量的党。到目前为止，它们的最大规模是几十万人，而不是几百万人。<sup>⑥</sup> 在一个具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这只是整个社会图景的一小点。即使如此，它们那

有限的目的也还远没有达到。它们无法摆脱共产党的控制，而且中共党员还常常把民主党派看作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在一所大学里，民主党派的研究被纳入了中共党史系。）的确，经选择或保留下来的多数民主党派成员都有循规蹈矩的天性。虽然这种状况可能会随着少量较有生气的新成员的加入而发生变化，但时至今日，民主党派成员中仍然是谨言慎行的老者占多数。这部分人通常都经过痛苦的经历而认识到附属于共产党的重要性。他们不会忘记1957年，那时新闻媒体警示民主党派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对共产党特别是党内左派的奴隶般的顺从。<sup>⑦</sup>因此今天普通的老民主党派成员抱有恐惧心理是不奇怪的。

民主党派是作为合法力量为政权服务的，尽管这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它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政权服务：首先，它们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以多党的民主体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是，一个外国人要形成这样的印象，就必须既消息灵通（全面了解民主党派）又不抱任何偏见，而这种人是不多见的。<sup>⑧</sup>在中国，民主党派是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取得合法地位的，因为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在40和50年代，中国共产党日益得到民主党派的支持而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且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最后，它们还经常扮演中国政府国内外政策的广泛支持者的角色。<sup>⑨</sup>

然而，也有些时候，民主党派的作用与此完全不同。它们偶尔也卷入到中共的宗派政治中去，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很少。例如，1986年民盟在推进“社会主义道德”的运动中被利用，当时举行的纪念《愚公移山》的活动，就是要回到毛主义的主题上去。<sup>⑩</sup>还有，在关于修建三峡大坝的争论（见



本书第七章)中,有迹象表明,九三学社是在四川省领导人的授意下而反对这项工程,因为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四川省遭受损失较大。这种情况也许不多见,而且照中国的情况看,这也是很不合法的。

较为合法的(以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表现在:各民主党派完全与中国人关于人们应当如何组织起来的观念相吻合。社会被区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都是统一的国家中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国民党人来说——他们30年代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这种观念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①虽然直到他们在台湾建立了政权以后这个原则才得到实现。②在这种体制下,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工商管理人员及其他职业者分别有各自的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存在都置于独裁主义者的控制之下。用西方的政治学说来解释,这就叫做阶级合作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他们作为一个公民,只是普通的工人、企业家、农民、医生或律师;一般的政治问题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太复杂了,他们只希望了解与自己的行业或职业直接有关的事情。”③比较大的政治问题,必须由一小部分懂得这些问题的国家领导人来解决。这是柏拉图、布洛克和黑格尔的观点。在国民党看来,控制复杂情况的权威机构应是国家。他们在1929年放弃了列宁主义关于(国民)党应该起这种作用的观点。但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这一原则,这就解释清了为什么统战部只有监督的职能,即使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国家支付工资。这样做基本符合菲利浦·施米特关于阶级合作主义的定义:“它是一种容纳各方利益代表的体制。在这种体制

下，各组成单位产生出一定数量的、负有特定义务的非竞争性组织。它们按等级制原则建立起来，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些组织都可以得到国家的承认或许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有权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推举代表。作为交换，它们在竞选自己的领导人以及反映各自成员的要求和呼声方面，同时也要受到一定的控制。”<sup>⑭</sup>

我们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要指明这个定义所阐述的要害在于其“强制性”。虽然各民主党派以及其他许多社团都是自愿组织起来的，并且在国家结构中占一席之地，但至少也要明白，如果他们不作出这种选择的话，那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还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在开头时把阶级合作主义与利益代表相提并论。显然，没有谁谈论民主国家中的利益集团之类的事。只有约瑟夫·弗史密斯在对1980年以前上海政治状况的描述中谈到：“看来，独裁政治具有通过建立一些有等级而无竞争性的、不起作用的利益集团而强制获得的利益。”<sup>⑮</sup>在开放社会中，有更有效的手段增进社会利益而不必简单地用官方来支持或抑制社会组织的发展。民主党派的目标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学家所说的利益，即试图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民主，这种价值倾向与国家领导人的价值倾向相一致的事实，并没有使“利益集团”这一概念变得不再适用。然而，中国早已过了极权主义或简单地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特征的时代。现代化意味着复杂化，随着技术统治取代个人统治，这个体制承受着许多方面的压力。在政治进程中，有胜者也有败者；胜者不全是共产党员，败者也不全是非党人士。其中民主党派虽不是最大的

赢家，但也比多数人获利多些。

当然，民主党派不具有美国国会那样的功能。但它们和所有利益集团一样，通过集体努力使其成员获得政治好处，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无党派人士同样得到好处。它们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如改善生活条件），也可能是出于公心（如维护社会正义），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建立民办学校，搞咨询服务等）。像这样使两方面都获利的情况似较普遍。例如，民主促进会改善公立学校的条件，就既是为其成员（教师）的利益服务，又是为社会利益服务。<sup>⑥</sup>利益集团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在每一社会，对于发挥利益集团的影响也都有一定的限制——这不只是民主党派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民主党派不太象现代组织。首先，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职能分散的特点。它们除了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党派外，还是一种行业联盟、利益集团和慈善团体，有时甚至是参与平反案件和致力于消除特权现象的专事调查、监督的力量。其次，它只吸收有一定社会代表性的人为其成员。要想加入民主党派，必须有一名本党派成员的推荐。

然而，民主党派比上面所分析的要现代得多。它们的各种职能并不是一个大杂烩，而是象典型的西方大公司具有的多种职能那样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发展成员上，民主党派并不限于自己所联系对象的某一部分，而是从各种人当中加以选取，问题只不过是妇女的比例还偏低。但最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国的传统的组织不一样。在民主党派内部很少有庇护关系。<sup>⑦</sup>在我采访过的人当中，没有一人说与支部领导人的私



人关系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发展新成员的工作不是在特定的社会圈子里进行，其关系也不是靠送礼和提供个人服务来维系。作为中国政治的特点，宗派主义无疑是存在的，但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调查中却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中国许多代表官方的知识分子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表现出受庇护者和庇护者的特点，而这种关系在民主党派中似乎是不存在的。1957年所表现出的真正的分歧，纯粹是政治和方向的争论。因此，根据中国的标准，民主党派应被视为现代组织。它们不是建立在世袭财产基础上的、互相拆台的旧式宗派团体，也不是政治活动不公开的秘密会社。恰恰相反，它们是由那些具有一般社会精神气质和政治目的，并具有共同（或至少相容）利益的人所组成的。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即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也不能说是一个极权国家。

民主党派的前途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86年，有一个有效地决定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口号，叫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概“辱”指的是过去；“荣”指的是将来。然而这个口号并不稳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整个关系也是如此。无疑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并不希望自己的命运与飘摇不定的共产党的声誉联系得过于紧密。当然，如果共产党政权取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成功的话，大家都会得到好处。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使中国的政治基础恢复活力。对民主党派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177名民主党派省委一把手的平均年龄是75岁，但已有400名较年轻的人被提名进入民主党派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岗位。<sup>⑧</sup>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民主党的中央委



员会和省委将有2—3名55岁以下的新领导人，<sup>①</sup>从而使这些具有惊人的生命力的组织在机构上进一步健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数现已达16万人，<sup>②</sup>这些民主党派成员有一半以上是在毛以后的时期加入的，所以用不了多久，毛时代的那段不幸的历史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这样，民主党派就可以减轻思想包袱，从而获得更为广泛的尊重。实际上，现在民主党派已经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才。396名有威望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约有一半是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但到目前为止，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样——不像50年代那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sup>③</sup>不管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要恢复当时的威望，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共产党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民主党派也不会做到。

#### 注释：

①卡罗尔·哈姆与蒂莫西·切克合编：《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前言），第10页。

②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见怀特：《中国的小团体与政治仪式》。这本书不是专门探讨民主党派问题的。

③中国的民主志士不大看得起民主党派。见詹姆斯·D·西摩：《第五个现代化：1978——1979年中国的人权运动》，纽约，1980年版，第234页。

④这个论断看起来叫人吃惊。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民主党派并不活跃）与1986年相比，中国大概是比较民主的（这种民主当然也不令人满意）。当时，普通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参加政治活动，尽管由于法律或制度不健全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⑤198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20位副委员

长中有10位是非中共人士，其中包括7名民主党派人物：史良（民盟）、胡愈之（民盟）、胡厥文（民建）、荣毅仁（民建）、许德珩（九三）、朱学范（民革）和周谷城（农工）。

⑥将来，由于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从理论上说，其规模还会扩大。

⑦199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⑧无论如何，民主党派确定在中国与外国人（特别是华裔外国人）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们经常接待外国代表团并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见李荣夏：《民主党派》，第20页）。此外，民革和台盟还是与台湾人民交往的便利渠道。

⑨例见新华社1984年9月28日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84年10月2日广播稿。在此，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⑩新华社1986年2月1日讯。

⑪这个问题的展开论述见约瑟夫·弗史密斯：《中国的政党、国家和风俗：1930——1980年上海的商人社团政治》，火奴鲁鲁，1985年版。

⑫我将在近期的另一本书中探讨这个问题。

⑬朱利叶斯·古尔德、威廉·L·科尔布：《政治学辞典》，纽约，1964年版。

⑭引自弗史密斯：《中国的政党、国家和风俗》，第163页。

⑮同上书，第190页

⑯本书很少论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但戈登·怀特在其《分配政治学与教育的发展》一书中论述了该党派。他指

出：民进积极为中国的贫困地区培养教师，从1984年到1985年，一共培养了6600名教师。

⑰作出这个论断以及后面谈到的许多论断标准是由安德鲁·J·内森：《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模式》一文（《中国季刊》，1973年1月）提供的。它给我的印象是：特权应建立于功绩的基础之上。上面谈到的缺少庇护主义会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

⑱关于上海民主党派引进年轻领导成员的情况，见《上海市政公报》，1986年3月10日。

⑲新华社1985年11月22日发布的消息称：八个民主党派（包括致公党和台盟）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为“近75岁”。

⑳李荣夏：《民主党派》，第19页。数字为1986年2月的统计数字，包括致公党和台盟。

㉑有一位非民主党派学者——一位我很熟悉并很尊重的历史学家——没能向我介绍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他说他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属于民主党派。他还补充说，“实际上，我们不能对民主党派评价过高”。

## 译 后 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日益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外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如何评价中国的民主党派，这方面的文献还所见不多。尤其比较系统地论述民主党派问题的专著，迄今未见译作面世。这里译出的西摩先生所著《中国的卫星党》，算是多少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缺憾。希望它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多党合作制和民主党派问题提供一点点可资参考的材料。

本书主要是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的部分同志翻译的。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牛旭光、竺伟荣、沈桂萍、谷嘉瑞、夏建中、郑宪、张晓星、吴晓静、李五四。牛旭光统校全书译稿，竺伟荣校对了个别章节。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劳鸿起、副教授余忠泉，现代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张三杰等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王书杰同志为本书的印刷给予了热情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本译著尽可能保持了原作的风貌。除对明显的笔误或其他有关错误作了更正或加注处理外，内容上未作删改。对于原作的三个附录——中国民主同盟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1957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座谈会纪要》（1957年）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1983年），本译著未予收入。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尚属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

指正。

译者  
1992年2月于北京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